

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2022年2月22日，在这个超有爱（2）的日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发布，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9年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关切，以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心和意志。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仍存在不少困难与挑战。

首先，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效率。其次，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城乡融合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空心化和农村人才流失，重建乡村生活，让乡村重新成为有人生活的空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之一。第三，重塑乡村文化，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振兴乡村经济产业，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我们创建的“乡村相见”小院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它既能助力乡村经济的发展，又能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最后，修复农村生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更是事关农民的根本福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施策、量力而行的原则，尊重农民意愿，尽可能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乡村振兴正当时。虽然疫情的蔓延给乡建工作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我们仍要对乡村和乡建充满希望，疫情的阴霾终将散尽，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也终将绘就！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孙麟

2022年04月14日

C 目录 Contents



主办单位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
支持单位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
农创投控 农道联众
顾问 李兵弟 孙君 伍跃时
编委会 孙麟 李 宁 彭 慧
孙晓阳
主 编 印亚兰
执行主编 闫效平
副 主 编 薛晴初
编 辑 余叶林 杨钰萌 林学敏
赵佳珍 梁红琴
发 行 李龙江
发行支持 昆明九州职业培训学校
编辑出版 乡村相见编辑部
地 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 218 号五楼
电 话 (0731) 82868928
网 址 www.villagemeet.cn
准 印 号 (53) Y000026
印刷日期 2022 年 04 月
印刷单位 真容书局 13759141312



乡村相见公众号



农道基金会公众号

乡村相见

- 农道小公益，乡村大作为 | 钟正洪 1
我眼中的乡村相见小院 | 皮业林 4

政说三农

-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全面解读 | 21 世纪经济报道 8
国家乡村振兴局：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 中国乡村振兴 11
韩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五处发力 | 《瞭望》 14

乡建观点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 | 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19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重建乡村生活 | 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28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 乡村发展研究 33

乡建探索

- 娘娘寨的环境改善 | 农道联众 42
用生态文明银行推动乡村振兴
——大南沟 2.0 版本 | 北京绿十字 44

乡建资讯

-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 农道基金会 48
乡村相见研讨会 | 农道基金会 51

农道摄影

| photography

“社区微公益创投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专题研讨会举行 | 农道基金会 52

农道天下进行阜平县脱贫攻坚建设回顾 | 农道联众 54

永泰举办第二期爱荆庄女性会客厅

传承良好家风 | 北京绿十字 59

女摄影师为村民免费拍全家福

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爱的故事 | 湘妹子 60

乡村相见 遇见未来 | 农道基金会 64

先行者，就是先干了再说 | 农道基金会 66

孙麟理事长考察长沙县金鼎山社区 | 农道基金会 67



敬老



和谐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

农道基金会于 2015 年 7 月在湖南省民政厅登记成立。基金会以“农为国本，道之以德”为宗旨，秉持“一体化乡村建设”理念，践行“开放、专业、务实”的原则，致力于搭建美丽乡村建设的公益生态平台。



《乡村相见》现征集乡村相关作品，投稿邮箱 villagemeet@163.com，并注明作品名称及拍摄地。期待您的参与。

农道小公益，乡村大作为

作者简介：

钟正洪：农道书院院长，原中共湖南省委农办，省农业委副主任，巡视员。

这次理事会和乡村相见研讨会，形式生动活泼，内涵丰富多彩。大家日常工作很多、很忙，为什么能沉下心来，用一天的时间，研究农道基金会、农村公益？过去，我们湖南经视有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做《乡村发现》。我从会议的报告和制度设计、从理事们专注的神情、从几位专家和志愿者的畅谈中、从南山村相见小院营运的实践中，逐步了解了农道基金会前进的方向，切身感受到了农道基金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现在，社会公益组织层出不穷、种类繁多，但真正关注乡村的不多，而以“小院”作平台聚合公益力量，服务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公益组织，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不敢说是唯一，确是少之甚少，目前湖南独此农道基金会一家。毛主席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农村公益市场广阔，虽然，目前农道基金会的规模不大，起步时间也不长，但我们的目标定位很具前瞻性，运作很规范，团队很专业、很有创意和韧性，



农道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合影



孙麟理事长在南山乡村相见小院上的演讲

因此，基金会从创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力量源自“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国家，顺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助力全面乡村振兴；有利于农民群众，顺应了农民群众的要求，给老百姓送出去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有利于社会，满足了日益蓬勃发展的乡村公益的需要，搭建了共建共享的平台。因此，我对农道基金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农道基金会有一个重要平台，是乡村相见小院。乡村相见小院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农道书院。前几天，我和秘书处的同志交流，薛晴初女士问我，农道书院是什么？首先，应该肯定地说，农道书院是个实实在在的有形的书院（屋），有书有院（屋），顾名思义，是个传播农耕文化的书院。但我们的书院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书院。我们的书院，不仅是个有形的院，也是个无形的院。它是一种特质，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教育现象，是一种精神。我们的心在哪里，书院就在哪里；我们的胸怀有多宽广，书院就有多大；我们的思想积淀有多深，讲台就有多高。如孙



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



乡村相见研讨会上钟正洪先生发表讲话

麟理事长在南山乡村相见小院营运启动仪式上的演讲，那天，冬日暖阳，讲台搭在南山广场，理事长在灿烂的阳光下面侃侃而谈。在我心里，他不仅是在做主持致辞，实际上是在授课，在传播小院文化、农道文化。那时，如果有人问农道书院在哪里？我想告诉你，在阳光下、天地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日益繁荣，种类繁多的书院、讲坛如雨后春笋，似灿烂星空。我们的书院如何在灿烂星空中定好位，放射“农道”独特的光芒？我认为，核心是要在传播中华农耕文化上有韧性和创新性。韧性讲的是坚守，创新性讲的是发展。中华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精髓是，道法自然，和谐共生。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所反映的是“自然而然”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今天倡导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质上与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和谐共生，是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然滋养人类，教化人类。和谐发展不是单一单调发展，它倡导的是和合之美，注重的是特色，追求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我们现在做的南山和龙顾两个小院，既有共性，都是公益

平台；又具个性。南县南洲镇的南山小院，是农创、农顺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行“两个优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上，新构建的一个“五位一体”服务平台和公益平台，“五位一体”即村政务中心、商务中心、医务中心、康体中心和书院汇聚在一个小院，这个小院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示范性、这是目前乡村公共服务和公益平台的一种高级形式。龙顾大院，是在原有龙顾院落基础上的改造升级赋能，它是以弘扬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为切入点，集聚公益力量服务乡村的实惠普及型，这种模式，投资省，见效快，可学可推。

我是老三农工作者。我们这一代搞农业农村管理的，大多知道有个小本子，叫做《农业八字宪法》。这个本子是毛主席提出制定的。其核心理念是，三分种，七分管。这种理念到现在还很适用。既适合农业管理，企业管理，也适合公益组织管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感谢吴道峰同志，为我们的乡村相见小院、农道书院加挂了几块“金字”牌子。如何把我们的乡村相见小院、农道书院、把我们的几块牌营运好、管理好，理事会、秘书处已经制定了规划，明确了实施路径和措施，很有操作性、实践性。这里，我要再重复讲几句：一是小院公益经营一定要围绕农道主旨坚



持公益方向；二是公益产品应坚持服务乡村经济；三是营运操作要坚持量体裁衣以小博大；四是实施方法步骤应坚持统筹谋划,突出特色,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突出特色,既要“小题”大作,又要价值发现。如对南山小院的运营和典型“包装”,就应做到小院落里凸显大格局,与社会公益、与区域发展、与全面乡村振兴的主旋律有机结合起来。如对龙顾大院,我们不能仅仅欣赏陶醉于那些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几堵泥巴墙,几把木椅,几次全村的流水席,而应着力发现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在金鼎山,龙顾大院又是乡亲们议事的“乐和”大院,传导的是一种“乐和”的乡村治理理念,倡导的是一种“乐和”乡土文化和精神。“乐和”意为乐道尚和,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良的一种处世哲学,是当代人们健康生活的一种态度,也是长沙县在湖南率先推行的一种乡村治理模式。我没有去过龙顾

大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建议秘书处和研究院的同志春节后挤出时间,沉到金鼎山作“乐和”文化专题研究,与老百姓一起去乐和乐和,在天地间、在农民群众间去切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对我们深化“农为国本,道之以德”的认识、自觉践行“农为国本,道之以德”的宗旨将很有裨益。

现在,“农道”的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尽管前进的路上仍有风雨泥泞,阳光总在风雨后。我衷心祝愿:在农道见乡村,在南山见未来!

■ 钟正洪

(来源:农道基金会)

我眼中的乡村相见小院

作者简介：

皮业林：研究员，注册咨询工程师（农业投资），曾任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区划党支部书记、省农科院人事处长等职务。先后主持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科研、咨询项目30个，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国家咨询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咨询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加快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农办印发的《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积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并加强融合载体建设。

近期，我到湖南农道基金会（下称基金会）在乡村建立的乡村振兴公益平台——乡村相见小院（下称小院）参观学习，发现小院不仅是一个公益平台，还是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平台。在乡村设立小院，对于构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一、小院设立及服务功能

（一）小院设立与运行管理

1、小院设立。基金会经过充分调研，在相关区域选择村“两委”综合素质好，或有公益组织对接，且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有代表性的村设立小院。小院选址村内交通方便、居住人口集中的地点，由村提供场地（包括房屋），场地必须是村集体资产。基金会与村委会或公益组织共同出资，对场地改造提质，并购置相关设备。经改建后，小院浓缩村民的乡愁，既有现代生活设施，又不失田园风光。

2、管理运行。目前小院管理运行班子有两种组建方式。一是村“两委”主委负责人牵头与基金会联合组建运行班子，依托小院成立象棋、书画、萨克斯、舞蹈等协会开展相关活动，如南县南山村小院。二是由当地公益组织负责人牵头，村民推选代表组成理事会，负责小院的运行管理，如长沙县金鼎山村小院。

（二）小院服务功能

1、传承与发展文化。小院设立“农道书院”作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阵地。书院设图书室，备有国学、政策法规、农业科技知识等书籍供村民阅读，培养村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村民的

知识水平和农业生产技能。另外，小院还不定期开展文化讲座，或讲授传统文化，或讲授政策法规，或讲授实用农业技术等，为本地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2、聚合社会公益资源。小院与社会公益组织广泛联系，有针对性地聚合公益资源，服务乡村振兴。目前依托小院入驻相关村的公益项目有：湖南大爱慈善基金会的“小小带领官”项目、天津市潮汐济困中心的“潮汐计划”项目、沈阳市安来社会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邻里安全行动者”项目、读者（深圳）传媒有限公司的“微光计划”项目、湖南熬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熬吧读书会”项目等。这些公益项目落地小院驻地村，或培养人才，或帮助开发特色产品，或建设公共设施，有效促进村域公共事业发展。

3、营造乡村和谐环境。小院不定期组织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下象棋、萨克斯演奏、跳广场舞、编排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等，在丰富村民农闲生活的同时，加强村民沟通，增进相互了解，营造乡村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小院融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

（一）补充和完善村民自治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根据乡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构建了“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体制。“乡政”即乡镇人民政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村治”为村民自治，并且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的组织平台，负责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

政府反应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乡村自治是我国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乡村治理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唯宗法”的制度，与现行村民自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乡村为伦理本位社会，由乡贤主持自治；现行的村民自治是一种现代基层民主制度，村民为自治主体，虽然在制度层面有本质区别，但治理任务都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办理村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小院对接社会公益资源，在村内兴办公益事业，促进村内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强村民自主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意识，是对村民自治的补充和完善。

（二）培养村民守法自觉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先建立法律规范。我国历来强调“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并将很多人们普遍认同并遵守的传统“礼俗”整理为法律条文。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追求的目标。依法治理乡村不仅仅建立一套法律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村民守法意识，只有每个村民对法律从内心的信仰到外在的行为一致，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法治。小院“农道书院”挖掘、整理、传承的本土优秀文化，其主要内容是长期形成的礼俗，如优良风俗习惯、乡约、宗法等。这些传统文化对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起着很大的作用，有的还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内容。小院传承和发展文化也是向村民普及法律规范、培养村民守法自觉。

（三）德治乡村基础平台

新中国成立以前，乡村基本上是一个封闭

且人口相对稳定区域。乡村是伦理本位的差序化社会，以“礼俗”为主要调节社会的行为规范。“德”是“礼”精髓，德治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治理手段。“德治”的路径是教化，以家族祠堂为基本平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对社会进行强力整合，让家庭原子化并拆除祠堂，打破差序化的乡土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结构逐步团体化。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乡村不再封闭，城乡之间交流频繁，乡村社会分层复杂化，“德治”乡村仍然有社会基础。“德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治理文化，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仍然将“德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段之一。由于乡村传统大家族解体治理功能失去，而村民委员会是一个民主治理平台，所以乡村德治缺少合适的平台。小院引导村民遵守公序良俗、守望相助，其实发挥着乡村德治平台作用。

三、完善小院治理功能的思考

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由浙江桐乡率先实践，很快在全国推广，并作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理论有些来源基层实践。设立小院是对“三治融合”路径的探索实践，如果对小院基层治理功能深入研究，有望将小院建设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标配平台。

1、科学合理布局小院。我国农村新一轮并村刚刚完成，行政村域普遍扩大，如果按行政村设立小院，有部分村民参加小院活动不太方便。小院设立应对村域交通状况、居民点分布等综合分析后，按行政村和自然村相结合的原则选址。



2、理顺小院领导体制。小院服从基层党组织领导，主要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并接受村党组织监督。小院是一个社会组织性质的公益平台，依法依规独立开展活动。

3、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农道书院传承文化，既要继承传统，从小院设计施工、到讲授的内容都要体现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又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本地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还要传授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将小院打造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培养基地。

4、拓宽公益聚合渠道。小院聚合公益资源的视野适当拓宽，对接外地公益资源的同时，还应对接本地精英和村民发动大家为村内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共同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5、完善小院运行班子。小院作为参与基层治理的公益平台，其运行管理班子组建村内“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模范、老退伍军人”为主体。这些同志受党和政府培养多年，思想觉悟高，有一定的文化和政策水平，了解村里的发展历史、文化底蕴，有利于提高小院的治理效能。

■ 皮业林

（来源：农道基金会）

政说三农 » »

聚集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导向，并对重要政策进行解读，科学把握新政为乡村振兴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全面解读



新华社 2 月 22 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 19 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当天就文件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稳中求进：两条底线、三项重点

唐仁健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打实地调整农业结构，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务必见到可考核的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力度，推动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

端牢饭碗：稳产量、调结构、保耕地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重大战略性问题。2021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3657 亿斤、较上年增产 267 亿斤，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仁健介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首要位置，目的就是要把 14 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固，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稳产量。应对去年秋冬种部分小麦晚播等不利影响，抓紧抓实春季田管，促进弱苗转壮，努力追回产量。粮食安全要共担责任，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销区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



种粮农民补贴，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合理保障农民收益。

——调结构。下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支持东北地区积极推行大豆玉米合理轮作、有序推进地下水超采区、不适宜水稻种植区开展“水改旱”扩种大豆，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扩大油茶种植面积。通过多油并举、多途并进，确保大豆和油料扩种取得可考核的成效。

——保耕地。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把耕地保护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抓好黑土地保护，不断提升耕地质量，真正做到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多措并举：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工作机制、政策举措、机构队伍等衔接有序推进，脱贫成果得到巩固拓展。当前，部分脱贫地区群众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遇到自然灾害、疾病、意外事故等情况有可能返贫

致贫。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

唐仁健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响鼓重槌地抓好，确保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

他表示，要聚焦重点人群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各地要精准确定监测对象，将有返贫致贫风险和突发严重困难的农户纳入监测范围，进一步简化识别程序，及早落实社会救助、医疗保障等帮扶措施，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同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更多依靠发展来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提高衔接资金和涉农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通过产业带动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通过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提升帮扶车间、优化公益岗位等多种方式，促进脱贫劳动力就业，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

“要加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力度，集中力量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项目，选派科技特派团，实行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有计划开展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不断提升搬迁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持续加大安置区产业培育力度，开展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唐仁健说，聚焦重点地区强化帮扶措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让脱贫基础更加牢固、更可持续。

乡村振兴：五级书记共同抓

唐仁健表示，“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后，新时代抓“三农”工作就是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扎实有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拓展农业多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这份文件题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全文共8个部分

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文件指出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党中央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文件提出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

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新华社发 孟丽静 编制

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三大产业；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健全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不超越发展阶段搞大融资、大开发、大建设。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加强农村道路、供水、用电、网络、住房安全等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

——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作用。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方法，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持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

“统筹推进重点工作，归根结底要靠党的领导。”唐仁健说，要制定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开展省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完善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把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同时，要建立表彰奖励制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乡村振兴局：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绝不能出现这边宣布全面脱贫，那边又出现规模性返贫。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巩固脱贫成果，强调切实维护 and 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

刚刚过去的2021年，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健全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加强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在西部10个省（区、市）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出台14个方面政策倾斜支持，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因灾返贫致贫风险，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工作。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住、拓展好，绝非易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始终抓

紧抓实。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强调，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各级乡村振兴部门和脱贫地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抓好工作落实，绝不能因为工作不到位出现返贫和新的致贫，绝不能脱贫成果没巩固住、去搞锦上添花的东西。做好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要继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即摘帽不摘责任、防止松劲懈怠，摘帽不摘政策、防止急刹车，摘帽不摘帮扶、防止一撤了之，摘帽不摘监管、防止贫困反弹，具体要抓好七项工作。

第一，抓牢“两个环节”，即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切实做到精准监测、精准帮扶。监测环节，各地要因地制宜建立监测标准年度调整机制，对监测对象不设规模限制，进一步简化识别程序，确保及早发现、应纳尽纳；帮扶环节，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监测对象风险类别、发展需求等精准施策，确保有人管、管到位；退出环节，严格把握退出标准，规范退出程序，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国家层面将印发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政策指南，对监测对象、退出标准、动态清零等统一规范，各地要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统一思想。要进一步完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监测信息

平台，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

第二，抓住“两个关键”，即产业和就业。产业发展方面，这项工作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乡村振兴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着力发展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逐步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净收入比重。落实好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用地政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出贡献。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在2021年已达到50%的基础上，2022年力争再增加5个百分点，达到55%，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强化龙头带动，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带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发展。加强农产品加工流通设施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库，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现共建、共用、共管。支持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乡土人才在脱贫地区创新创业。继续用好小额信贷政策，组织实施好到户类产业帮扶项目。就业帮扶方面，要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稳住脱贫人口就业规模，力争有所增加。要压实各地责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把2022年就业任务分解到省，作为2022年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的重要内容。要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把跨省务工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作为2022年东西部协作协议的重要指标，纳入2022年东西部协作成效评价内容。要促进就地就近就业，中西部地区要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探索开展省内劳务协作；乡村公益岗位聘用脱贫人口数量要稳中有增，同时要进一步规范管理；帮扶车间要明确脱贫人口就业比重，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解决好搬迁脱贫家庭零就业问题。要加大支持

力度，继续安排衔接资金支持东部地区用于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落实好就业帮扶各类补助政策，延续支持帮扶车间发展优惠政策，探索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解决订单不足问题。

第三，抓细“两个重点”，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坚中之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补齐的区域短板。2022年要参照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做法，组织编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各层级都要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统筹整合资源，打出政策组合拳，集中力量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国家层面将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实行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有计划开展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并建立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监测评价机制。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积极配合、抓好落实。搬迁群众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特殊群体，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后扶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举措。中央明确，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双牵头。乡村振兴部门要主动作为，着力推动解决安置区配套设施不完善、社会管理跟不上、群众办事“两头跑”等问题，探索解决人口自然增长、生活成本增加等新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促进搬迁脱贫人口稳得住、能融入。

第四，盯紧“两个风险点”，即医疗保障和饮水安全。这两项指标是衡量脱贫人口是否稳定脱贫的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成果是否巩固，是当前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风险点。医疗保障方面，各地都制定了巩固拓展医保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措施，但部分地区一刀切取消了脱贫人口医保资助政策，有的没有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纳入参保资助范围，基层担心脱

贫困户“脱保”而引发返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从调研情况看，云南、贵州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全部纳入参保资助范围，过渡期内对脱贫人口参保资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实行逐步退坡的做法很好，各地要充分学习借鉴。要持续跟踪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参保和医保政策落实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医保等部门反映，推动解决。同时，要继续配合有关方面解决个别地方存在的不切实际的过度保障问题。饮水安全方面，一些地方投入不足，新建供水设施资金难以保障，一些地方受气候变化影响供水缺乏保障，一些地方供水工程管护不到位、保障程度不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护。下一步，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建设上，要强化全程质量管控，严把产品质量关、施工质量关、竣工验收关，确保质量过硬。管护上，要用好衔接资金，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工程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和农民主体作用，开发护水员等公益岗位，加强日常巡检和设备维修，确保工程持续发挥作用。

第五，抓实“两个基础”，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扶贫项目资产。据统计，全国75%以上的农村集体资产集中在14%的村，不少村缺乏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不仅影响村级事务开展，也影响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要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设施出租、股权投资等新发展模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扶贫项目资产，目前已基本摸清底数。要建立健全管理长效机制，对道路和饮水等公益性资产加强后续管护；对经营性资产加强运营管理，做好风险防控；对到户类资产加强指导帮扶，推动扶贫项目资产持续发挥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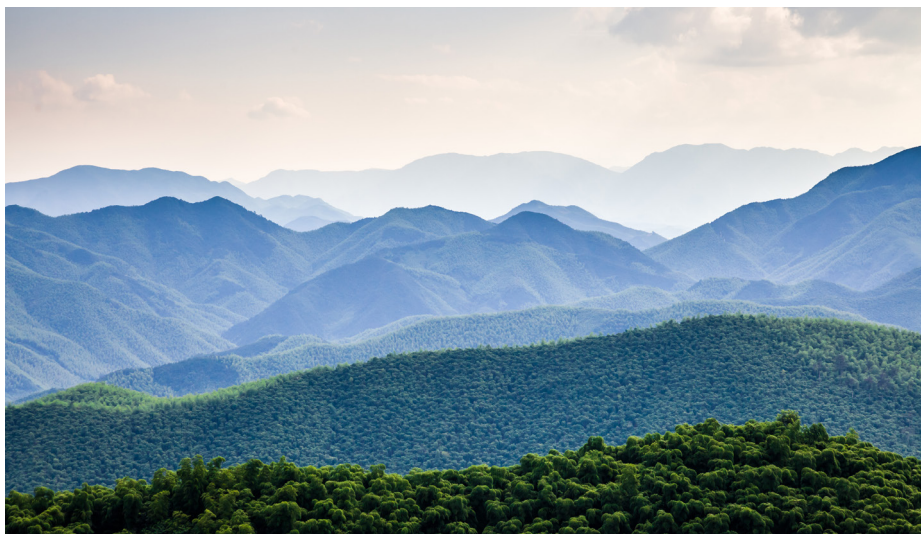
第六，抓好“三类帮扶”，即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社会力量帮扶。各类

帮扶力量要围绕促进脱贫地区发展特别是产业振兴进行调整优化，切实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保障。东西部协作，重点是做到“三抓三促”，即抓帮扶、促巩固脱贫成果；抓示范、促乡村振兴；抓合作、促区域发展，促进东西部协作谱新篇。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重点是保持帮扶力度不减，不断拓展帮扶领域，调整完善结对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单位帮扶作用。社会力量帮扶方面，各地要深入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帮扶，做好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专项工作，不断凝聚社会帮扶的强大合力。

第七，用好“两支力量”，即驻村工作队和农村基层组织。驻村帮扶方面，2021年已完成选派和轮换，2022年要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作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理清驻村帮扶工作思路，细化驻村帮扶任务，重点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及农村党建等工作。要加强驻村干部管理考核和激励保障，推动驻村干部沉在村里、干在一线，带领强村富民。有针对性开展驻村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持续提高发展经济、群众工作和基层党建等能力。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配合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推动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促进退伍军人、返乡大学生等更多本土人才充实村“两委”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心协力、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



韩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五处发力

截止到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近两年,顶层政策设计持续完善。其中,省区市每年向党中央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的制度已建立,并延伸建立市县报告制度。到2019年底,省区市建立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

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他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为根本,坚持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

韩俊: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顶峰时为8.6亿人,到2018年农村常住人口已降至5.6亿人,减少了3亿人。下一步,如果按

照2030年我国人口峰值14.5亿人、城镇化率70%来测算,未来10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还将减少1.3亿人左右。

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亿人,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接近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44%,相差16个百分点,也即约有2.26亿农民长期生活在城镇,但还未有户籍身份。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全国离开土地的农民有2.88亿人,其中常年举家外出务工经商的有3000万户。过去40余年,农民大规模离土离乡,完全改变了我国就业结构,农业生产方



式、农民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所以推进城镇化一定要回归到推动更多的人口融入城市这个本源上来，继续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什么深刻关系？

韩俊：现代化必然是由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乡村共同组成。我国之所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农村仍有4亿多人口。没有乡村的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进城了，城镇化发展了，“三农”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重新发现并利用好乡村的多元价值，使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能够相互协调，形成双轮驱动，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让现代化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四个优先抓好“三农”

如何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韩俊：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找出来，解决好，不开空头支票。同时，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说到做到，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具体的做法，就是做到四个“优先”。

一是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把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把精锐力量充实到基层一线，注重选拔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充实地方各级党政班子。近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懂“三农”，会抓“三农”，分管负责人应该成为抓“三农”的行家里手。

《条例》强调，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其主要精力要抓“三农”。同时，提出要选派优秀干部到县乡挂职任职，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干事创业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使用优秀的农村工作干部。

二是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引导和支持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各类发展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和集聚，释放农村发展潜力。

《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医生队伍素质，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和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等。

三是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县域新增贷款主要用于支持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

据初步测算，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确定的重点任务，总投资需要7万亿元以上。尽管当前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但压力再大，也要按照中央要求，把“三农”作为优先保障领域，增加总量、优化结构、



提高效率。

四是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近1/3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收集和处理，80%的村庄生活污水无法处理，拥有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只有48.6%，1/3的行政村内的道路没有实现硬化。下一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还比较繁重。

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为根本

当前如何围绕让农民富裕起来推进乡村振兴？

韩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要充分发挥农村资源、生态、文化等优势，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实现产业兴县强村，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一些区域性的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

二是农产品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现在许多优质农产品还是在田头卖，还是提篮小卖，还是“披头散发地”卖，

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要学会给农产品“梳妆打扮”和营销宣传，加强农产品产后的分级包装、仓储物流营销，特别是加快补上冷链物流等短板，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做足文章。

三是大力发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当前，乡村基础设施落后，最突出的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落后，要培养大量适应数字农业发展的人才，赋予农民更多的数字化工具。

四是让农民合理分享农业产业链的收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但也不是简单地以一产去接二产、接三产，关键是完善各类利益主体的联结机制，通过就业带动、订单农业、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能够合理地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五是粮食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多年来，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就是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农民种粮吃亏是粮食生产最危险的时候。二是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保障产粮大县抓粮得实惠、有发展，不能让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越吃亏。

制定粮食政策，要始终把这两点作为最基本的立足点，各级地方政府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任何省区市无论耕地多少，都要承担粮食生产责任，特别是粮食主销区要切实落实责任，不能把“饭碗”的问题都丢给别人去解决。如果一个地方真的把粮食生产搞没了，就是抛弃了责任。这方面需要有硬约束。

更好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在继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什么说要更好地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韩俊：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是把文化建设放在乡村振兴更加重要的位置。乡土文化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传统的建筑急剧减少,乡村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文化特色遭到破坏。

以城市审美标尺改造农村的做法,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乡村建设退化为简单的环境整治,甚至等同于建筑立面的化妆式改造,乡村建设“千村一面”,乡村美食、文化习俗、传统手工艺、生活形态日益“去乡土化”,乡村社会关系和文化特色在一些地方快速消失,乡村文化甚至日渐荒芜。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这是我们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把乡土文化传承保护好,还要不断地发扬光大。乡村振兴要提倡见人、见物、见生活,传承活态的乡土文化,保存文化基因,守护文化根脉。

二是提升乡村文明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当前,乡村文明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违背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一些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和过度消费盛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弘扬乡村文明。

三是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有效的治理,就没有乡村全面的振兴。目前,乡村治理仍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薄弱环节,要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点从治理理念更新、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手段创新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推进乡村治理的



现代化。

乡村振兴一定要从容建设

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怎样才能保证不走偏、不变样?

韩俊:现阶段,有的村庄肯定要向城镇形态演变,像大城市郊区村,有的村庄会长期存在,有的村庄会逐渐衰落消亡,这符合村庄演进规律。但哪些保留、哪些整治、哪些缩减、哪些做大,都要科学论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只有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才能不走偏、不变样。

乡村振兴一定要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能光追求速度,特别是不能不顾农民意愿,把建设城市那一套放到农村照抄照搬,大搞撤村并居集中上楼,搞得治理半径越来越大,基层组织离农民越来越远。

村庄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要扎实做好市县村庄空间布局规划。要科学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型村庄规划,注重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保留乡土风情风貌,不断挖掘田园和乡土价值,扬农村之长、补农村之短,打造各具特色美丽宜居的现代乡村。

(来源:《瞭望》)

乡建观点 » »

来自乡建领域专家、学者针对“三农”相关问题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为新时代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提供理论和智慧支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我国城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人财物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随着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乡村基层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2020 年新春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城乡社会发展稳定形成极大冲击。两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乡村发展平稳有序，表明乡村基层治理成效总体较

好。疫情防控工作检验、锻炼和提升了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本文根据笔者和同事在全国各地实地调研，特别是行政村党组织书记的访谈，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进行初步总结分析。

一、研究村级基层治理需要更为开阔系统的视角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基层是指乡镇及其以下的行政管辖区域，包括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多数地方用“村”来指行政村）。乡村基层治理的重点在行政村级治理，简称为村级治理。从文献资料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把乡村基层治理定位于村级治理，即行政村范围内的治理。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领导本乡镇的基层治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生态环保、美丽乡村建设、民生保障、脱贫致富、民族宗教等工作。乡镇范围的基层治理任务也是村级治理的任务，但是，两者的实际运行存在明显区别。作为基层治理基础部分的村级治理，是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帮助下开展的，很多情况下要依靠行政村自身特别是村庄内部的力量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以自治为主的治理。乡镇党委政府层面代表的是国家力量。

一般来说，“村”有两种含义，一是村庄或村落，即所谓的自然村。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聚集而居的地方，有明显的地理边界。二是行政村。这是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人为划定的，其地理边界有时不明显。我国北方行政村大部分与自然村同构；南方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自然村落一般面积较小，户数不多、人数较少，一个行政村往往包括多个自然村。在流动性不强的传统农村，村庄内部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频繁、联系紧密，是村级治理的基础单元。因此，很多时候村级治理首先是指村庄治理。

21 世纪以来，随着乡村快速发展变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对乡村基层治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选取一个特定角度，例如，党建引领、社会资本、法治、德治、自治、网格化、信息技术运用、公共服务、治理队伍、政社关系、社会组织作用、基层减负等，对乡村基层治理进行剖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研究的整体性和纵深感不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为乡村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提供了工作遵循。学术界及时跟进，形

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更多是从微观层面探究村庄内部“三治”结合的做法、机制、条件、成效以及逻辑等，剖析了一些村庄治理的创新案例，不足之处是缺少从乡村外部和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维度来深入分析乡村基层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的轨迹、特点和规律。

二、乡村基层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村庄开放性不断加强

中国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村落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也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县（市）之内，由于村庄的自然禀赋和区位差异，村与村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虽然不同地区村庄形态和禀赋各有差异，但是，在小农经济时代，一个村庄内部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外界交往较少，信息闭塞，村民思想观念相对保守。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村庄的开放性越来越强，上过学、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一代不再愿意像其父辈那样回到村庄生活。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农民工经历了离土和返乡的代际转换。改革开放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少人在外务工经商多年后，从城市和外地回到家乡生产生活；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人绝大多数坚定地走出村庄，到城市、到经济发达地区、到就业机会多的地方寻找就业发展机会。村庄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再是限制和阻隔村民与外界联系的篱笆。在村民与外界交往交流增强的同时，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内各家各户忙着自己的生产生活，共同劳动

生产的机会不多，交往交流远不如集体化时代那么频繁。因此，村庄开放性带来两个不同的后果，一是增强了与外部的联系；二是引发村庄内部结构变化，村民之间异质性增加、同质性减少，乡村内部的血缘地缘业缘联系弱化了。

推动村庄边界开放和扩大的力量，一是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流动的门槛和成本，使农民有权利有能力走出乡村，选择他们愿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二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介入，推动乡村功能扩展，带动土地流转、土地整理及其功能变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庄改造和行政村撤并都使得村庄物理边界不断变化。村庄边界开放和变动，使得农村的含义越来越模糊。哪里是乡村、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成为含糊不清的问题。市场和行政双重力推动下的工业化、城镇化使村庄形态和内部差异越来越大。例如，有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也有欠发达地区的村庄；有城镇附近的村庄、靠近政府所在地的村庄、交通便利的村庄、资源丰富的村庄，也有偏远地区的村庄。村庄在开放中发展，也在开放中扩大差距。

（二）村庄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趋势加剧

村庄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后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办企业，绝大多数村庄常住人口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曾经所谓的“386199”（“386199”中的“38”是指妇女，“61”是指儿童，“99”是指老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一起或全家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青少年出村入市求学读书成为常态，还有一些家长特别是年轻的妈妈们陪孩子在外读书，种种情况都使得村庄里年轻人大量减少。留在村里的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主要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亲、本人身体不太好或在外找工作有困难的人。访谈资料表明，全国各地农村家庭户平均人口在4人以下，说



明多子女家庭越来越少。这就预示着乡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对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提出新要求。

（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凸显

村庄既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生产劳动的场域。在同一场域下密切互动使得村庄内的居民容易形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就是乡村社区。我国“大国小农”的现实决定了农村家庭的承包土地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地方农民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地，多的地方人均4—5亩地，少的地方人均几分地。多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经商。除了极少数山区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之外，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机械化播种收割，依靠社会化市场化进行生产管理和服 务，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大降低，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留守在村的老人和妇女能够不再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耕作。由于种粮收益低，不少农户种地积极性不高，人力物力投入较少甚至撂荒承包地。家庭人口减少，家务劳动相应也减少。经济条件好起来，生活有保障，空闲时间多了，这就使得业余文化生活需要凸显出来。受到大众传媒和城市文化的影响，流行于城市的广场舞进入乡村，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村庄内部的文化活动一旦开展起来，又会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带动更多的人参加

文化娱乐活动。

（四）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村民参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以及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比较高。一般来说，村“两委”换届选举同时进行，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在前，选出村党支部书记、委员和副书记，然后再选举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其他村委会成员。从访谈了解的情况看，所有类型农村地区，无论外出人口多少，村民对选举“两委”主要负责人都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即使在外务工经商，也有不少村民在选举日回到村里参加选举投票。一些不能回乡的村民，也会通过微信群或委托他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投票意向。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其委员选举成功的关键在于推荐提名。各地均严格按照规范程序，确定候选人。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的选举在党员中进行，而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委会成员由全体有选举资格的村民选举。党的十九大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普遍实行“一肩挑”，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两委”成员实行交叉任职。这样就减少了村“两委”人员，提高了决策议事工作效率，减少了村级经费负担。访谈的村党支部书记全部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说明党支部书记得到村民的认可。村民参加村“两委”选举的投票率都在85%以上，极少数低的也在60%以上，最高能够达到95%左右。尤其是集体经济较好的村，村民对参选“两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职位非常积极。虽然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不在村里居住，但是，他们非常关心村主要负责人选举，表明仍然关心本村的发展，村庄仍然是他们物质和精神的依托。总体看，村庄经济越发达，发展条件越好，人们政治参与热情越高。除了参加选举，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也十分关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尤其关注。主要表现，一是

直接向村干部反映个人诉求和意见建议，二是村民代表踊跃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并发表意见。

总体来看，各地乡村人口外流现象严重，乡村职业多样化、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村民社会需求增多增高。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实行更大力度的帮扶政策，向乡村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致力于推动城乡资源双向合理流动。其结果却是一方面国家公共资源向村庄、向基层扩散，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继续向村外、向城市集中，冲击着传统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

三、乡村发展为基层治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家力量在村庄内部结构及其日常运转模式变化中起到了加速推动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有效。到2021年，帮助农村成功消灭绝对贫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村庄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乡村基础设施脱胎换骨

农村基础设施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在生产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绝大多数地区基本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利化程度也普遍较好，几乎100%实现了良种化。访谈了解到，近年来不少村庄成立了农业机械化服务社，国家设立一些项目为种粮大户提供专业化服务。种粮大户多数都有大型收割机，有的使用无人机喷药治虫。各地普遍开展土地整治、池塘整修、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普遍种植杂交水稻和优质小麦玉米。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只有少数山区、丘陵地带以及少数特殊品种的经济作物因不适于大型农机作业，采用小型农机具或人工作业。这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稳产高产提供了保障，也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享受更好的生活。

除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外,自来水、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各地农村全部通上了电,广播电视以及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所有的村庄都修了水泥路,有的甚至是柏油路,部分村庄安上了路灯。农村交通出行、通信联络较为方便。大部分地区农户用上自来水,饮水供应及其安全有保障。相当部分农村居民开始用罐装液化气,只有少数村民还在使用煤和柴火作为燃料。所有这些都改善了乡村的发展条件和村民的生活品质。

（二）农村人居环境极大改善

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变化。农村垃圾基本实现集中清运处理,“厕所革命”深入推进,污染处理得到重视,河湖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从调研和访谈情况看,各地农村垃圾以户为单位基本做到了桶装化、袋装化,多数实行外运集中处理。一些地方受访的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村民家里有小垃圾桶,袋装后放入环卫公司放置的大垃圾桶内直接运走。村民小组都摆放有大垃圾桶。水泥路修到什么地方,环卫垃圾桶就摆放到哪里。环卫垃圾车定时全村循环流动收集垃圾。由于村民环保意识和专业能力有限,垃圾还不能完全做到分类处理。

“厕所革命”南北方差异较大,进展和效果不一。总体而言,对于农民传统的如厕习惯和环境卫生改变有较大促进作用。南方各地由于水资源较为丰富,冬天不是很冷,卫生厕所建设受到群众欢迎,进展较为顺利,效果也较好。北方由于缺水以及冬天寒冷的原因,村民对旱厕改为冲水厕所接受度较低,工作进展缓慢,一些地方甚至存在形式主义或者改造后的厕所弃而不用现象。少部分经济发达的村庄还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前几年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些地方农村河湖污染、水质恶化,经过整治这种状况普遍得到改观。近年来农村连续开展危

房改造、脱贫攻坚安居工程建设、易地搬迁、道路新修整修、河湖整治、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工程和项目,绝大多数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少数破旧民居大多为人口外流家庭,很少有人居住。实际上,这类家庭通常在城镇都有更好的住房。

（三）基本民生有了保障

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相当一部分居民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不仅是饱食安居,而且子女教育、看病和养老都有较好保障。由于村庄普遍人口空心化,学校生源越来越少,村里的小学纷纷撤并,极少数勉强维持的学校也很难有完整的6个年级,一个班级的学生多的十来个、少的两三个,好教师常常引不进、留不住,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年级较高的学生一般都在乡镇中心小学寄宿读书。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集镇、县城或者城市读书。和城市家庭一样,农村孩子普遍能够接受学前教育,上幼儿园成为刚需。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所和村医,乡镇都有卫生院,常见病基本能够及时得到诊疗。农民看病特别是大病住院的65%以上费用能够从医疗保险中得到报销,大大降低了医疗负担,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居家养老,老两口相互照顾,身体好的还可以种地种菜养鸡,有时还照顾留守在家的孙子孙女。农民养老费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儿女提供的生活费,二是从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领取的养老金，三是自己生产经营等获得的收入。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住进敬老院或幸福院，由民政部门和村集体提供相关保障和服务。

（四）公共服务方便高效

相当一部分行政村都设有综合服务站或党群服务中心，每天有人按时上下班提供村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镇政府设有综合服务中心或便民服务中心，有专门办事服务窗口。一些地方还开通了网上办事窗口，方便村民办事。农村居民需要认证、办证的事务，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基本上只用跑一次，当时就可以办结。行政村无权或无法及时办理的事务，办事人员会给村民解释，并指导村民如何办理。对于年老体弱、文化程度较低、家庭原因走不开的村民，一些行政村还实行代办业务，由村干部或专门人员收集村民需要到乡镇或县市办理的事项，专门为他们服务，有时由村干部协调相关机构上门服务。总体而言，各级服务机构办事程序简易清晰，办理工作规范，办事流程公开透明，办事人员服务热情，没有听到推诿扯皮、吃拿卡要现象。村支部书记们普遍反映，村民到政府部门办事方便高效，感到比较满意。

（五）村民切身利益得到保障

社会治安综合深入推进，为村民提供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各项权利保障。2018—2020年，党中央组织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惩处了一批“村霸”“路霸”“市霸”和宗族恶势力。2021年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常态化阶段。一些受访村党支部书记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乡村选举和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村民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监督村干部的行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家加强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为农民外出就业、回乡生产生活提供了定心丸。农民工流入地的公共

服务逐步向流动人口延伸，也使农民工能够更多地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国家出台一系列保护政策，使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稳定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预期，缓解了他们的流动焦虑，维护了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为他们在流动中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保障。

四、乡村基层治理形成诸多经验

国家力量对村庄发展及其日常事务的支持和帮助，使得乡村治理有了良好的外部支撑，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打破了村庄固有的封闭和低水平自我循环，为村庄开展自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村庄外部力量与村庄内部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村庄有效治理，丰富和扩展了“三治”结合的经验。

（一）党的领导是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有了改善，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组织力和领导力都有较大提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增强了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办事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尤其是经过脱贫攻坚战锻炼的村党组织，普遍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反映村民合理诉求；带领村民谋划村级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关心帮扶困难群众；进行农村环境整治，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开展乡村文化体育活动，推进移风易俗；调解村民矛盾纠纷，维护村庄治安秩序。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方面注意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有为青年培养发展为党员，另一方面，注意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创造条件让每一名党员都能够平凡的岗位上有机会服务群众，在急难险

重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党的全面领导为村庄治理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的发展目标、有效的组织动员、充分的资源保障、温暖的人文关怀、妥善的利益协调和先进的榜样示范。

（二）民生保障是基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和改善是做好村庄治理的基础条件。不少村书记反映，“多个工厂，就少几十个二流子；多个学校，就少一批文盲”。人们有就业机会，收入有保障，无事生非、违法犯罪现象就会减少。村民有事干，村里没闲人，这是村庄治理的基础。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村庄，村民可以在本村或就近务工经商，同时还能照顾自己家的承包地，农忙时和工余时间在家里打理田地。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壮年农民一般都会外出务工经商，平时不回村庄，家里的事情交给父母料理。家家户户都在忙于自己的生产生活，人际交往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对较少。村庄人少、人忙，工作生活的交集不多，利益关联度不高，相互交往交流较少，降低了产生矛盾纠纷的概率。

（三）公共服务是手段

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的一种形式，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基本的、范围广泛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公共部门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除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乡村公共服务还涉及村民建房、婚丧嫁娶、村庄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身份资格证明、卫生防疫、矛盾纠纷化解、村庄秩序维护、公益岗位安排、生产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等。狭义的公共服务，主要指村级组织和政府对村民个人和家庭需要的服务保障，例如，开办学校、建立医疗和养老机构，为村民



提供婚姻和生育服务、办理户口、建房和企业经营许可证等，税务和车辆服务、社会保险费缴纳、养老金领取和医疗费报销，开具各种证明材料等。这些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生产生活事项，主要由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经办。过去这些事项多是村民家庭和个人直接与相关部门打交道。现在各地村干部普遍实行坐班制，每天安排村干部轮流在村委会值班，方便群众办事。近年来，在简政放权、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要求下，各地不断创新服务村民的办事方式，服务机构和力量下沉，方便村民在家门口就近办理相关事务；或者由村安排专人集中代为办理，有时由专业部门上门服务。能够在网上办理的不再要求到指定机构办理。一次办妥、一日办结成为常态。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明显改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公共服务将村干部与村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改善公共服务过程中，村干部的威信提高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了，达到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良好效果。

（四）群众参与是途径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现代村庄治理中村民既是治理的客体更是治理的主体，他们在享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遵纪守法，行为言语要符合法律、道德和村规民约的规定。同时，他们更是村庄治理的主人，作为

村落共同体的一员，村庄的发展稳定与其利益紧密相连。这种联系既有现实利益的成分，也有文化、情感和道义的因素。由于村庄开放、流动人口增加，村庄居民不仅有原有村民也包括外来人口，人们逐渐认识到村庄治理既是原有村民的责任，也是外来人口的权利。新老村民都是村庄治理的主体和客体。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人，大家都应当行使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重要条件是他们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参与村庄治理。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青年人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农民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村庄公共事务十分在意，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主要表现为关心村“两委”选举、村级事务管理、农村发展建设规划、公共经费使用和资源分配等。针对这种新要求新变化，各地村级党组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普遍加强村委会、党员和村民活动室等阵地建设，建立作为工作议事平台的各种微信群，使村民有地方及时接收信息、反映意见建议、参与村级事务讨论。村民与村干部交流沟通，提高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也有利于决策的执行。一些村庄在党组织领导和支持下建立各类社会组织，村民在组织中有序参与管理、参加喜欢的活动。不少村庄注意发挥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在协商议事、村级管理中的作用。一些地方还成立乡贤理事会，使退休返乡人员、退伍军人、回乡创业人员等乡村精英有相互交流和参与村务管理的平台，提高了群众参与的质量。

（五）文明乡风是要求

文明乡风既是村庄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目标，还是有效手段。乡风体现着文化，文化反映着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影响甚至决定

着人的行为取向，调节着社会关系。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差异，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点，村落文化是地方性“小传统”和现代性“大传统”的结合体。

富了口袋还要充实脑袋。封闭的乡村文化在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不断受到冲击，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逐渐走进乡村生活。近年来，广场舞也成为农民文化休闲健身的主要形式。一些地方乡村干部因势利导，对村民自发组织的广场舞、秧歌、坝坝舞、球类运动等民间文体活动给予经费、场地、器械、技术指导，还组织开展比赛，规范引导村庄文化娱乐活动健康发展。一些地区有地方艺术剧团，既自娱自乐也服务村民，活跃乡村文化。少数条件比较好的村庄还在广场上安装了健身器材，设有棋牌活动室，方便群众健身、打乒乓球、下象棋围棋。

村庄传统文化惯性很强。受到现代教育和城市文化浸染的乡村青年，一旦回到乡村，受到邻里舆论和集体行为的压力，理性选择经常让位于传统习惯，个体的理性屈服于集体的非理性，一些村庄的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消费攀比之风在经济发展中沉渣泛起、水涨船高，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名目繁多的酒宴，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给村民带来沉重负担。针对这些情况，各地乡村普遍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移风易俗。不少地方还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规定了参加婚丧活动的人数、礼金标准、宴席标准等，遏制了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一些地方举行干净人家、美丽庭院、孝老爱亲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比，使人们学有榜样、做有激励，推动村庄形成健康和谐的精神风貌。

（六）制度创新是保障

新时代村庄治理需要不断进行地方性制度创新，以适应村庄内外条件的变化。各地通过

一系列地方性制度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了将党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优秀干部选拔出来，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村“两委”成员选举规定了一系列规范程序，酝酿提名、宣传动员、投票选举等每一个环节都十分严格。为了规范和约束村干部权力，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各地都规定村财务等相关事项通过村务公开栏或微信群等形式定期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村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重大事项执行“四评议两公开”程序，充分尊重民意，保障村民民主参与的权利。村干部坐班值班、乡村综合服务中心等，都是基层党委政府和村干部服务村民的重要制度创新。

为了规范村民的行为，推动村庄社会有序运转，国家鼓励和支持各地乡村结合当地特点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村庄乡土道德规范有机结合的产物，它以村民容易理解、便于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村规民约制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推动村民深化对相关问题认知、理解和形成共识的过程，是村民受到教育的过程。村规民约的实施，使村民的日常行为有了遵循的规范和标准。此外，不少地方还探索运用信用黑名单、道德银行、志愿活动积分等制度，激发人们的善念善行，抑制不道德甚至违法违纪行为。制度及其实施的本质是治理方式科学化，通过建章立制，促使村民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引导和调节社会关系。

乡村基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等外部力量影响和改变着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其发挥作用又必须通过内部治理力量来实现。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村庄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乡村基层治理创新。

五、乡村基层治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我国各地乡村基层治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但是，访谈和走访调研了解到，不同村庄推进基层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特点，治理效果有较大差异，有的治理有效，有的勉强维持。绝大多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维护水平不高，甚至面临经费不足、难以为继的困境。公共服务和基本民生只是有了基础性保障，与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每月能够领到的养老金只有100多元，不足以维持老年生活。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每年每人要交300多元，一个家庭一年要交1000多元，部分低收入农民反映负担较重。一些没有受益或受益较小的家庭缴费积极性不高，村干部代收医保费难度大，医疗保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青壮年以及儿童仍在离开乡村，这与农村教育医疗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质量相互影响，会进一步加剧村庄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使得村庄发展活力受限，公共生活面临新难题。乡村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治理人才极度匮乏，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很大困难。村“两委”干部年龄普遍较大，但是，可以培养和使用的青年后备干部人选有限。一些在外务工经商的青年人有人入党的意愿，但是，由于不在家乡无法成为培养对象。近年来，各地向乡村下派了大批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以缓解乡村基层干部人员和能力不足的压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长远看，乡村振兴和乡村基层治理有效的根本还在于乡村拥有结构合理、规模适度的人口，在于拥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基层治理人才。如何留住乡村青年、吸引青年人返乡参加乡村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 龚维斌

（来源：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重建乡村生活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水平就在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是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农村出现空心化，农业劳动力出现女性化、老龄化，而农村居民逐渐被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名词代替。在一些地方，因为农村学校的撤并，甚至农村连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一并转移到城市中，农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这些人有些可能因为年事已高，有些则可能因为残疾，使乡村生活已经无法正常延续。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要扭转这种态势。重建乡村生活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振兴不同于农村振兴，乡村与农村不同之处在于乡村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强调的是人，如果没有了人，乡村肯定不存在了。所以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于使乡村重新成为有人生活的空间。

乡村何以衰落

乡村的衰落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各地都普遍存在乡村衰落的现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方国

家在历经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原有的乡村社区不复存在，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导致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东亚地区在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不断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但是老龄化、空心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小农户的不断破产，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乡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乡村之所以衰落，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其原因在于城乡的产业分工，或者说是农业经济的脱嵌，乡村不仅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场所，甚至连多样的产业也逐渐消失，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被单纯的农业生产空间所替代。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人们生活的场所，产业发展服务于乡村居民的生活。乡村的首要产业是农业，但是在农业之外有许多服务于当地人生活的产业，如农村的匠人为乡村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工具，乡村知识分子则提供了教育和教化的功能，老人或精英则维持了



乡村秩序。即便是农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因为村民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因此农业也具有多样性。农民选择的作物品种首先要满足当地自然条件，如旱作区域的小麦、水田的稻谷和山地的薯类作物。其次是规避风险的需求，村民会选在在不同的地块种植不同的作物以规避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再次，农民要考虑家庭的需求，从而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生活的不同需求，比如要种植蔬菜、粮食，甚至粮食也要有不同的品种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为了维持乡村的社会生活，乡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由于乡村生活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乡村文化中对自然往往充满敬畏之心，人们祭祀土地、龙王、山神，并由此形成了乡村共享的价值。在乡村中有着各种各样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形成各地不同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成为乡村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维持着乡村的社会运行。事实上，大量乡规民约的制定都是为了解决乡村社会生活的问题，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组织、社会网络维持乡村的稳定，比如基于亲属网络的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甚至在乡村中，金融服务的提供也大部分是通过熟人之间组建各种“呈会”“合会”或“台会”来解决的。

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城乡的分工，乡村被赋予了农业生产的责任，所有非农的产业都被转移进入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动，乡村也不再是村民生活的空间，而成为了农业车间，以生产农产品为目标。当乡村成为单纯的农业生产空间以后，乡村不足以吸引人，由此导致人口外流，并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落。

首先，农业产出的低效益造成了城乡的收入差距。随着城乡的分工，乡村的其他产业逐渐消失，比如工匠的产品被工业化的产品所替代，工匠没有了生存空间；文化产业转移到城市，乡村居民成为文化的消费者而不再是文化的生产者。由于其他产业在乡村消失，村民只能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这个时候乡村遭遇了巨大困难。农业是依靠自然资源的自然生长过程，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产出量较低，不可能像流水线一样大批量生产，在与城市工业生产相互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地位。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或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都不足以维持村民的生活，发达国家的农业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在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农民生存在贫困线之下。

其次，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农业造成了机器排挤人力。当乡村成为农业车间，农业生产的逻辑也被工业生产的逻辑所替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农业开始了专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乡村居民生存需要，因此原来多样化的农业被单一作物种植所替代，而单一作物种植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规模化生产需要机械化的保障，机械替代人力的过程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减少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力。农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乡村人口的减少，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还在继续进行。

第三，随着人口的减少，乡村的生活空间瓦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



流向中心城市，大量乡村的房屋被废弃，道路损毁、学校关闭、商店倒闭。乡村的文化、社会组织和规范也很难再发挥作用。城市吸引人的不仅仅是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更多的是作为生活空间和消费空间，进入城市意味着现代的生活，而留在乡村则是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生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用了40年时间迅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也遭遇了农村衰落的过程。在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迅速提高，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得到改善。农村的道路、用电得到普遍改善，农村住房更新换代，即使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其生活的重心仍然是在乡村。但是在后20年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民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镇，全家外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被废弃的房屋和被抛荒的土地越来越多，村庄空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有些学者曾希望“农民年轻时候在城市打工，年老了回家种地”的社会分工越来越难以维持。农村人口外流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人口越少，留在乡村生活越困难，就会更加向往城市生活。

当农村仅仅被作为农业生产的空间，其衰落是必然的，单纯依靠发展农业产业发展也不足以实现乡村的振兴。尽管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人口数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村人口的外流仍然会不断加速。如果说在前

20年，农民因为经验和技能不足面临着外出打工的困难，我们的政策支持了农民外出务工，但是在后20年，农民可能面临的更多困难是如何留在乡村，大多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农民甚至不知道如何留在乡村，不仅因为农村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也因为农村已经没有了社会生活。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与人的城市化相对应，也存在一个人的乡村化问题。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五个振兴”的策略，所有这些振兴都是建立乡村生活重建的基础上。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既是乡村振兴的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目的，因此人的乡村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乡村生活的重建首先需要建立人口的双向流动机制。在农村改革以前，为了减少城市压力，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但是因为户籍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往往被作为城市的流动人口对待。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打破户籍的限制，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城市化正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种流动一直是单向的，是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就变得特别重要。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一些地方利用农民废弃的宅基地，吸引城镇居民到乡村生活，这些措施对于扭转人口的单向流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既需要鼓励农村人口回乡创业，也要打破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障碍。由于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乡土社会的制约，城镇人口向乡村流动还存在诸多障碍，即使一些希望到乡村生活的城镇人口也很难在乡村扎根、与乡村融合在一起，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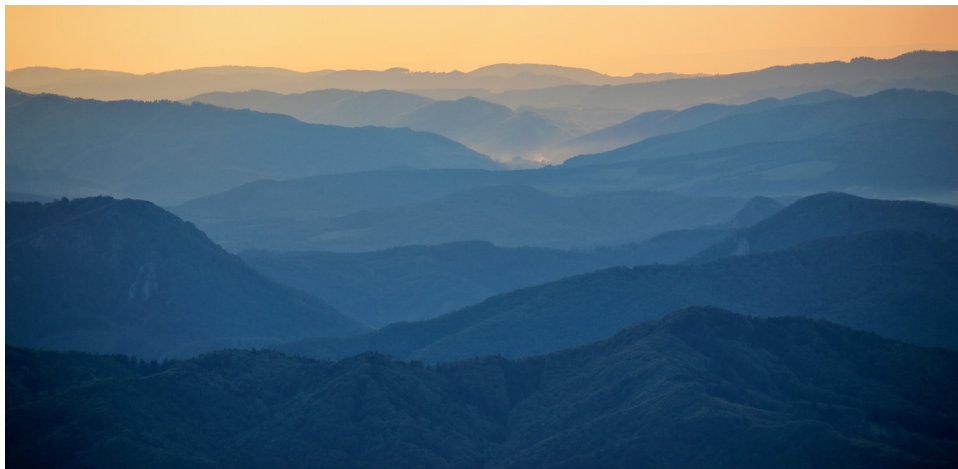
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需要打破乡土社会的封闭性，让更多的人可以生活在乡村。

其次要完善乡村的社会服务。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除了经济原因，如缺少就业岗位和收入低，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乡村的社会服务不足。在一些地方，正是因为学校向城镇集中导致最后想留在村内的人也放弃了农村。尽管近年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在不同地区也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卫生问题、医疗问题、饮用水问题等等，这些短板造成乡村生活的困难。村庄社会服务不足有着多方面原因，政府投入不足也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成本高有密切关系。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因为分散居中和人密度小，同样水平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有很大差距，当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搬到城市居住的时候，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会更加困难。社会服务和乡村人口相互制约，要打破低水平的社会服务和人口减少的恶性循环，就需要提高乡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使乡村成为吸引人的居住空间。

第三，保持乡土特色。要使乡村成为吸引人的居住空间，就要营造与城市不同的生活

环境。贫困的乡村不能吸引人，同样城市化的乡村也很难吸引人，生活空间的重建要有乡土特征。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并非是将乡村城市化，更不是将乡村建设成低端的城镇。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有更多的农村建设用地被利用，用简易的楼房代替农民的院落和平房，使乡村生活失去乡村的特色。尽管在短时期可以获得农村建设用地的收益，甚至通过增减挂钩增加财政收入，但是长期来看，因为农民上楼使乡村与城市雷同，失去吸引力的乡村生活必然会增加重建乡村生活的困难。事实上，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上楼工作已经遇到了困难，随着农村人口减少，一些新建的乡村楼房开始大量空置。同样，现在一些发展高大上民宿的乡村也很难持续发展，因为高端民宿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乡村生活，短期停留的只是一些游客。乡村生活的特点在于其乡土性，乡土性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乡土社会要让人有机会更亲近自然，亲近土地，自然构成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其次，乡土性也体现在密切的人际关系中。在乡土社会中，社会成员是相互依存的，尽管重建乡村生活空间并非完全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但是乡村生活要使乡村居民有更多的互动和密切的关系。

第四，产业振兴不仅要满足外部市场需求，



也需要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市场的逻辑是专业化生产，包括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通过资本的运作，将农业生产与市场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对于乡村居民来说，也需要地方市场满足其生活的多种需求，目前一些乡村市场逐渐被外来廉价商品所占据，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少，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削弱了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在重建乡村生活空间中，地方性的产品生产、产品交换也需要建立起来，特别是需要促进地方市场的重新活跃。乡村不仅要通过服务城市获得收入，而且需要自我服务。

乡村生活重建的实践问题

重建乡村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乡村生活重建过程中，首先需要破除阻碍乡村生活建设的制度因素，其次要探索不同的建设模式。

首先是乡村布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乡村的布局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交通、通讯的发展一方面把分散生活的乡村居民联系起来，改善了边远山区的乡村生活；同时也促进了人口的相对集中。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的布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应该以提高乡村的宜居性为首要条件，通过空间布局的改善，使乡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吸引力。乡村布局不仅需要政府规划，也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中心城市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和服务。各地的地理、文化不同，乡村布局会呈现不同的特色，在乡村规划方面既要有超前性，规划引领未来乡村布局，同时也留下弹性，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

其次是地方文化问题。许多乡村文化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占领，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许多本土知识不能被流传，本土的仪式濒于灭亡。乡村生活的意义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乡村文化，就会失去乡村

生活的意义。现在一些地方通过编辑乡土教材、进行口述史研究、编纂地方志、举办地方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挽救本土文化，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对地方文化进行整理，并通过地方文化的传承增加乡村的社会认同，提高乡村的凝聚力。文化活动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来搭台，文化活动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

在乡村生活的重建过程中，外来人口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些乡村地区，一些外来人口已经以各种方式已经进入了乡村生活，如何使这些乡村外来人口成为乡村居民并融入乡村生活，是一个值得谨慎对待的政策问题。乡村生活的重建有赖于打破原有乡村的封闭系统，促进城乡的双向流动，但是农村集体的形式又天然具有排斥外来人口的属性，本村人与外来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很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在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过程中，需要探索新的组织形式促进乡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和融合。

中国的乡村振兴要应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遭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乡村衰落的问题，另一面我们还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农村贫困问题，这使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任务更加艰巨，更需要各地的创新经验，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将农村建设成宜居之地。

■ 王晓毅

（来源：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

——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摘要：高效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能够为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对世界各国乡村治理现状的思考，文章总结出三种乡村治理模式：以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欧美模式、以巴西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从三种模式的实施进展中对比和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典型做法和宝贵经验，并且以此为根据，针对我国乡村治理中组织机构、自治德治法治、公共服务、减贫长效机制建设等领域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一）我国的乡村治理进程与主要问题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自198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高度关注乡村治理问题。2018年我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且记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和政府把振兴乡村提到新的战略高度。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我国的乡村治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引导着乡村治理领域新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在乡村治理领域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和改善。首先，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乡村行政机构缺乏效率。其次，乡村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不全面，传统优秀乡村文化作用不显著。再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偏

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民保障不完善。此外，社会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均等化程度较低。

（二）研究进展

目前在乡村治理领域，学界研究重点集中于乡村治理的模式与制度、乡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创新等领域。

第一，关于乡村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不同的学者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关系、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和分析，普遍认为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由单一化朝向多元化发展，进而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以提高乡村行政效力和治理效率。

第二，关于乡村治理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优质的乡村人力资源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诸多学者总结我国乡村人力资源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并从教育配置、资金支持、政策制度等层面提出切实中肯的建议。

第三，关于乡村治理国外经验模式的参考和借鉴。学者分析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经验，主要是从乡村土地规划、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及农业农民培育等方面进行深层面剖析。

基于以上成果，通过文献归纳法和分析法，从国外乡村治理发展模式出发，参照我国国情，从更为全面的角度综合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宝贵经验，分析其共性之处，并针对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乡村治理的国外模式与具体做法

本研究基于各国的政体制度、实际国情、



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在东亚地区、欧美地区和南美地区挑选出乡村治理的典型国家，以影响乡村治理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与政策为线索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出东亚乡村治理、欧美乡村治理和南美乡村治理等三种发展模式。

（一）东亚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1.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为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提高农户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并提高居住环境质量，1970年韩国政府推动开展全国性的“新村运动”，以政府出资支持和提供政策支持与引导农户自主发展相结合，并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政策实践：

第一，政府为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匮乏落后的现状。首先是针对农户居住房屋的修缮，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生活环境质量，增加农户的信心和认同感。其次是针对交通道路的修建，增强乡村与城市联系，便于人员的流动和农产品的运输。最后是修建公共供水排水系统以及电网等生活基本建设设施。

第二，韩国政府调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注重改造国民精神，引导农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的正确价值理念。韩国政府准确地把握农民脱贫致富的意愿，较好地激发韩国国民精神，将新村运动与塑造农民价值观念结合开展，使得二者起到相互促进的

作用。

第三，注重政府的支持与农民的集体性自主决策相结合，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能动性。韩国政府鼓励农民发扬创造精神和探索精神，利用自身力量去改变所处现状。在韩国，村社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民大会，农民会为乡村发展提出建议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调动集体的智慧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较好的决策。此外，韩国政府也注重发展乡村农业教育，注重培育职业型农民和农业技术人才，为韩国乡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农村人力资源支持。

第四，“新村运动”后期阶段，韩国政府发起了全国范围的“一社一村”运动。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和企业资本力量，让一家公司或者企业与一个村社建立“一对一”的扶持协助关系。此外，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废除耕地购买上限、设立农庄法人、扶持农村第三产业、大力发展观光度假旅游等措施。公司和企业可以为乡村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优质社会资源，对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造成冲击，较大程度地改变乡村原有面貌，为乡村治理补充新的人力资源。

2. 日本的“造村运动”

日本开展“造村运动”的背景与韩国开展“新村运动”的背景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振兴乡村，保障农户利益，缩小城乡差距等。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立足乡土，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并且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日本为岛国，地形较为复杂，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此外，着重发展乡村“1.5次产业”战略布局，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农产品价值获得

提高,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

第二,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日本农协具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和高度的农户覆盖率(95%以上),形成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全国性组织网络。农协是负责农业生产指导、农业生产物资和农民生活物资采购、农产品销售运输、信贷支持保障和提供社会服务的互助性非营利农民合作组织。农协作为村行政组织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协调村民与村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成为村民与村行政组织的有效沟通渠道,能够有效团结村民,扩展乡村治理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乡村治理的效力。

第三,设立严谨的乡村治理法规体系。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日本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振兴地方建设公团法》(1962),《山村振兴法》(1965),《市民农园整備促进法》(1990)和《关于为搞活特定农村、山村的农林业、促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律》(199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1999年日本政府进一步颁布综合性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法案。

(二) 欧美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1. 美国城乡共融型的乡村治理体制

美国政府注重以城带乡,利用城市优势资源协助乡村治理,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逐步形成一种城乡共融型的乡村治理体制。

第一,建立美国特色的城乡共融型的小城镇乡村治理模式。美国地广人稀,农民数量较

少,人均占有土地数量较大,农业产业成熟和农民收入高等因素,小城镇模式成为美国乡村治理的最佳载体。美国农村放弃代理与委托制度,村民权利平等并且共同参与乡镇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村民的共同决策被视为有最大效力和最高公信力。小城镇的优美自然风光、放松的生活节奏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吸引大量城市居民“返乡”,由城市向乡村迁移的“人口回流”有力促进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形成城乡融合的和谐发展局面。

第二,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农户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为农户发声。美国大部分家庭农场主会参与到农户互助合作组织里,加入农户互助组织是完全自愿的,不改变农户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户合作互助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农民集中性的力量,有效减少农民与政府沟通的障碍。注重建设代表农民的利益乡村的农民合作组织,为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新的活力,增强农民对乡村治理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第三,以《美国农业法案》和《纽约乡村法》为代表的美国乡村法案和立法体系指导乡村规划与治理。《美国农业法案》注重保障农民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致力于为每位农民提供均等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保障。此外,完善农村公共设施是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条件,也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纽约乡村法》是美国乡村立法的典型代表,体现美国乡村以自主立法为主、以中央宪法条令作为补充的成熟立法体系。以“法治”方式设立规则制度,使得村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按照乡村立法肩负起各自的责任,自主投入到乡村治理,形成良好的乡村自治管理模式。

2. 法国的农村组织改革和文化恢复政策



法国与中国相似，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漫长的乡村发展历程中，形成独特的村庄管理体制和悠久的法国乡村文化。

第一，建立法国中央高度集权领导下的农村市镇组织自治制度。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激发农业与农村的活力，增加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信心和积极性，法国政府在 1982—1983 年通过《有关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由法案》，利用“中央权力转让、赋予地方部分自治权利”等方式重新构建法国农村市镇政权体系。农村政治组织主要包括市镇议会和市镇政府两部分，市镇议会和市镇政府共同形成法国农村市镇组织的二元基本结构，实现中央权力与地方自治权力的合作参与，有效培养农村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积极性。两种市镇组织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共同负责参与乡村治理，有效推动法国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

第二，注重恢复和发展法国乡村文化，培

育农民职业化新理念。自从 20 世纪法国农村逐步走向衰败和落后，法国政府将乡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施行乡村文化政策。注重以乡村美景为基础开发乡村观光游览，引导法国人对自然风光的追求和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回溯；注重改善法国乡村文化设施匮乏的现状，增加乡村地区博物馆、剧院以及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比例；注重对法国传统乡村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开发，使得自然资源与乡俗文化契合发展，传播珍贵的乡土特色文化，形成以普罗旺斯为代表的诸多典型乡村文化区。此外，在从文化层面深化乡村治理的同时，法国政府改变对农民的传统观念，成功地赋予“农民”新的职业内涵，增强农民的自信心和满足感，培育乡村新的价值理念。

（三）拉美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1. 巴西的乡村治理经验

巴西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引起城市病、贫富

收入差距过大、乡村建设发展水平落后等诸多严重问题，社会矛盾较为严重。为了稳定乡村秩序，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巴西政府在促进农民脱贫减贫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巴西政府施行土地改革计划以调整乡村生产关系，缓解乡村矛盾。巴西的农业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绝大部分优质土地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庄园主手中，而大部分小农户仅共同占有少量土地甚至无法分配到土地。为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减弱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调解农村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巴西政府开展实施“土地改革计划”：一方面，巴西政府把国内农业产业向尚未进行农业开发的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同时鼓励大部分的贫农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为这些农户提供免费的农业土地用来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巴西政府筹备专项资金成立“土地银行”，向贫困农户提供信贷用来购买农业用地，促进农地市场的流转程度；此外加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第二，巴西建立健全相关的乡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巴西社会矛盾、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有效增加农户收益并且保障农户的权益。农业生产方面，由“全国农村信贷系统”为农户提供优惠信贷资金用以支持农产建设、农产品生产等环节，推行“联邦政府购买方案”，实行“家庭农业支

持计划”等。社会福利方面，进一步推广“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社会救济”。

2. 阿根廷的“农村发展国家战略”

阿根廷存在着与巴西类似的问题，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贫困现象严重，乡村发展落后，乡村治理体制不完善。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环境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农户收入，阿根廷政府在近年推出“农村发展国家战略”。“农村发展国家战略”更为关注农业的整体发展质量，以支持农户为核心内容，减少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农户的数量，降低贫困发生率，确保农户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首先实行全国性的农村脱贫战略计划，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方式的脱贫指导。其次，推动建立农民合作社组织，改变以往直接出售农产品初等品的方式，改变低收益的传统生产模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三、国外乡村治理经验的归纳与分析

上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自鲜明的特点并积累宝贵的经验，通过对上述国家乡村治理做法与经验的梳理，本研究从乡村治理的体制结构、村民参与度以及适用性条件等角度出发，主要总结出三种典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其主要特征：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引导发挥农民参与治理积极性的

表1 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对比与归纳

治理模式	主要目的	治理体制	主要特点	发展道路
东亚乡村治理模式	保护农户利益、缩小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	政府引导、村民主导	重视农村教育和人才培养	利用先进企业带动落后乡村的发展
欧美乡村治理模式	保护农户收入，提高农户的专 业水平与生产规模化水平	设立以议事组织和执行组织为 核心的乡村二元行政组织	以城带乡，利用城市优势资源 协助乡村治理	积极发展培育乡村文化，主 动立法保障农民利益
拉美乡村治理模式	减缓社会矛盾，保障人民温饱	推动土地改革与土地分配并建 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初 步探索实践建立农民权益保障 体系	利用国家力量和财政资金推 动农村的脱贫减贫

东亚乡村治理模式，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注重乡村德治法治建设并发扬欧美乡村文化的欧美乡村治理模式和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扶持农民脱贫并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拉美乡村治理模式。

（一）东亚国家的乡村治理经验

日本和韩国在乡村治理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日韩两国同为发达国家，且都具有人多地少、农业产值低特点，而且两国在治理经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都能够赋予乡村和农民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并强调重视农村教育和人才培养。

1. 由政府引导、村民主导的乡村治理体制

以韩国为例，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充分调动和发挥韩国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协同合作推动当地乡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韩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和资金补助方面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并不会直接参与到乡村发展的规划管理过程中。乡村的建设规划、农业生产等重要事务均由当地的村民大会所决定，农民在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政府引导、村民主导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避免上级政府对乡村真实面貌了解不充分的情形下对乡村治理进行盲目地干预，政府适度的引导和支持可以加快乡村治理的步伐。当地农民在获得发言权和决策权后会增加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乡村治理进言献策，村民的集体决策智慧能够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乡村发展速度。

2. 注重开展农村教育和农村人才培养，充分挖掘利用农村人力资源

人才资源是最稀缺宝贵的资源，乡村治理体系运转同样需要大量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来维持。日韩政府尤为重视农村教育和农业人才培养，通过正规教育、职业培训、讲习班和开

办乡村学堂等多种方式综合培育乡村人才，同时发动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支援农村人才的培养，例如组织高校的教职工去农村讲学传播文化知识等。通过多种努力，逐步形成多层次的综合性的覆盖广阔的教育培训体系，培养出大批能够全心投入到乡村治理和农村建设的人才队伍，为以后的发展和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欧美国家的乡村治理经验

美国和法国作为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典型代表国家，都是在完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后开展乡村治理的，并且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果。美法两国经济实力雄厚，工业体系健全且发达，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并且已形成显著的城市示范效应，城市充足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开展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1. 以法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注重精简乡村行政结构，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自治作用

两国的农村都设立以议事组织和执行组织为核心的乡村二元行政组织。政府把乡村治理的权力交还给农民，农民通过议会会议共同协商决定村庄治理的公共事务。以村民自治为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和行政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培养农民对乡村自治参与的积极性与责任感，让农民通过集体智慧解决乡村的内部问题，让每一位村民为乡村治理贡献自身的力量，完全激发乡村治理主体中蕴含的巨大活力，有效推进乡村的恢复与繁荣。

2. 完善乡村治理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使乡村治理有法可依，有序执行

美国乡村立法和执法体系是由地方自主负责，由于不同地区的面貌不同，不同地区的乡村法律具有独特的立法理念和执法特色。美国乡村法律覆盖面广，涉及乡村治理领域的规定

较为全面,对乡村治理主体、责任与义务的划分以及议事的决定方式和执行方式等方面有详实明确的规定,并且设定严厉的惩罚方式,使得农村居民不敢逾越警戒线,较好地发挥乡村法治所应有的作用。

3. 恢复和发展乡村文化,更好地发挥乡规民约的德治作用

通过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修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保护和开发乡村传统文化项目等多种方式,让农民切身接触感受乡村文化,重拾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美好理念。通过培养发扬乡村传统文化,宣传符合正确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乡规民约;通过道德层面的非正式约束,来规范和调整乡村秩序;通过乡村特有的方式解决村民的纠纷与矛盾,以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手段来维持乡村治理秩序。

(三) 拉美国家的乡村治理经验

巴西和阿根廷国家是拉丁美洲的典型国家代表,二者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问题、土地问题等诸多棘手问题。两个国家为乡村治理付出诸多努力,它们在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经验收获同样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1. 开展农村土地改革以调整生产关系

巴西的农村土地改革计划是较为温和的土地改革行动,综合考虑到大庄园主、贫穷农户、财政负担限度等多方利益,在尽量避免使既得利益者(大庄园主)收益受损的情况下,为贫穷农户提供优惠信用贷款来购买农业土地,降低农户购买农地的难度,从而获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农户向开发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迁移并免费为贫困农户提供相应的耕地。推动农民迁徙有两点好处:第一,可以有效解决东部地区人口过于拥挤、人口密

度较大以及耕地资源不足等问题;第二,可以更好地实施巴西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战略,及时补充进行地区性农业开发所需要劳动力等资源。

2.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扶持多元化产业布局来帮助农户减贫脱贫,通过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巴西政府通过发放财政资金来推行农村家庭支持计划、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减少农户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的负担,从农户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对农户进行支持和补助,帮助农户实现永久性脱贫。阿根廷政府注重从产业布局发展的角度,根据地方特色指导农户进行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把地方优势产业与农业产业结合起来,延长农业生产链条,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从农户生计角度帮助农户找到合适的生计方式,从而帮助农户脱贫。

四、国外经验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对比分析可发现,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偏向于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并且能够结合实际状况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美乡村治理模式偏向于议会制和乡村自治模式,同时注重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发展乡村文化来完善乡村治理体制;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乡村治理模式侧重于通过社会保障和优惠贷款等方式来减少贫困,采取温和的土地改革制度来缓解农村矛盾,倾向于优先解决农村居民生计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国外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但是应该充分结合到我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乡俗文化背景。我国应该结合当前乡村治理方面的不足,在中国实际国情和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借鉴经验,并且积极探索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质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建立政府引导、多元化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参考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日本的“造村运动”，确立政府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引导地位。欢迎和鼓励乡村中的农户、青年人才、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化主体治理机制。乡村的主要公共事务由各方主体协商共议，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征求各方的意见，使得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审慎合理。政府主要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服务作用，负责乡村治理组织的建立和维持，保障制度的落实和实施，使得基层组织能够有效满足农民诉求。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和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让更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显著增加乡村治理的受众面积，让每个人产生责任感和参与感，提高个人对乡村治理的关注度，让公共的事情变为“个人”的事情。

（二）完善乡村治理法律条令，发扬传统优秀乡村文化

以乡村自治为核心建立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应该明确乡村行政组织的权责范围、农地所有权归属、农户合作组织权责，明确划分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乡村法律的设定、颁布、实施和修改过程中遵循法律程序，让乡镇政府和村两委合法行使权利，减少农民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处理农民矛盾纠纷时，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处理，处理问题规范化、程序化，保证“法治”的权威性与高效性。同时加强乡村文化的建设，通过引荐新乡贤、礼治和传播优秀宗族观念等多种方式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理念，让原有的质朴的乡风民俗继续发扬传播，充分发挥乡村内生秩序体系中“德

治”——无为而治的作用，引导农民在合理合情的尺度内做事，有效减少冲突矛盾的发生，促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局面的形成。

（三）以城市发展和二三产业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通过以城带乡模式带动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以往城市对乡村资源的虹吸效应。参考美国的城乡共融发展模式和法国的农村一体化改革运动，一要注重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城市资源的涓滴效应来建设乡村，提高乡村的治理水平；二是结合城市的资金优势对乡村建设进行支持，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三是尽可能开发与农业农村的合作项目，通过合作实现产业优势资源对农村的带动，促进乡村的农业产业化运作。

（四）细化治理乡村贫困单元，形成减贫与改善乡村治理的良好互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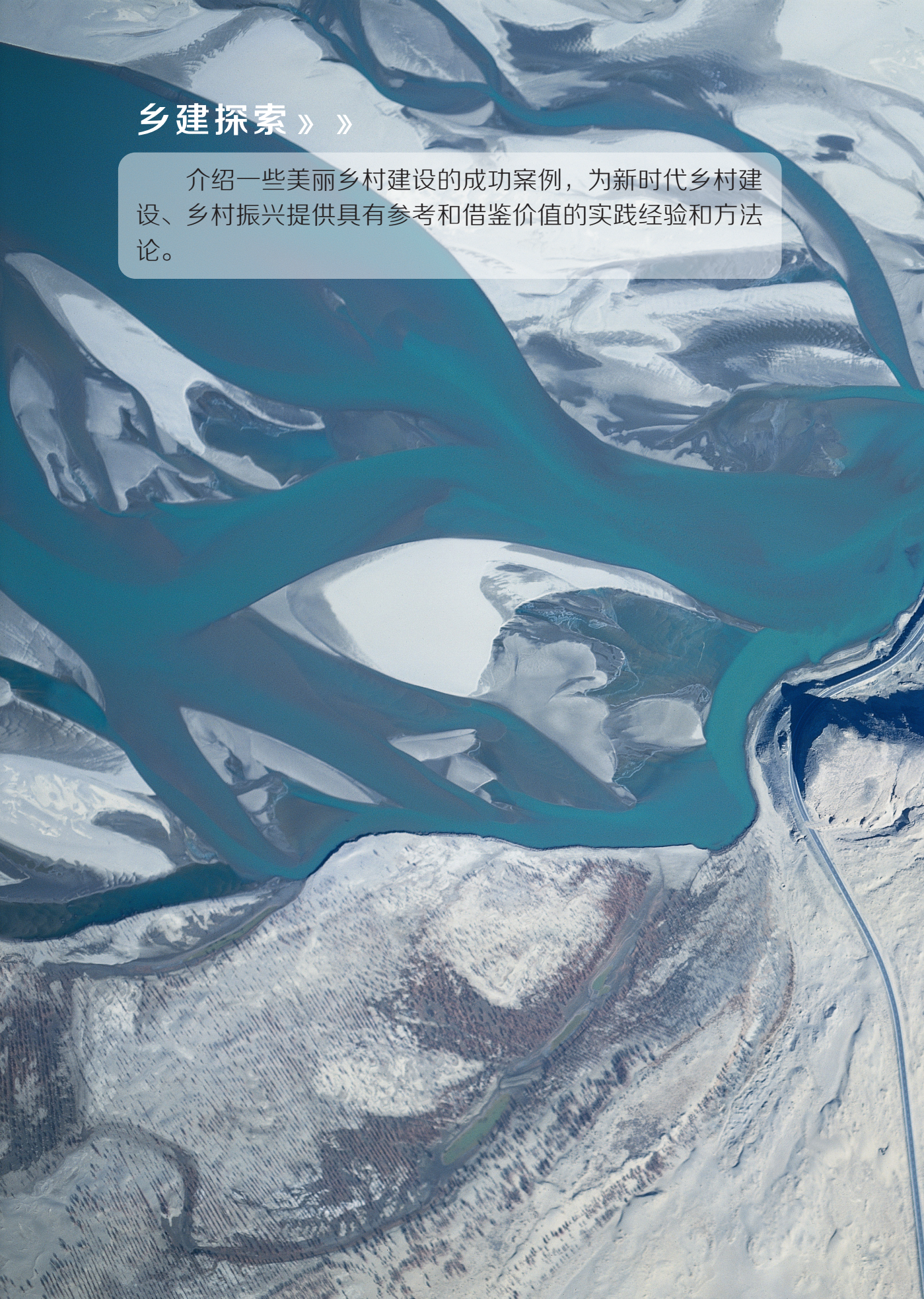
通过细化治理乡村贫困单元，做到有效识别精准帮扶，注重提高减贫效率并维持脱贫的长期效果。政府应该进行专项拨款作为脱贫村的长效脱贫资金，从乡村本身挖掘地理优势资源进行项目建设并给予农户一定数额的贷款资金，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脱贫成果巩固后，农户才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到乡村治理和村庄建设中，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从而形成脱贫减贫工作和改善乡村治理的良好互动。

■ 李金锺

（来源：乡村发展研究）

乡建探索》》

介绍一些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为新时代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提供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实践经验和方法论。



娘娘寨的环境改善



娘娘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保持了如世外桃源般的感觉。从黄仙洞的入口经过 40 分钟的溶洞行，再上 126 级台阶进入娘娘寨，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另一条进山的道路也崎岖不平，因而这里的车辆很少，整个村庄非常难得地保留了很完整的原生态。故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概念来进行该村的环境改善，打造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1. 自然环境

本地自然环境状况很好，但黄仙洞景区开发的一些地方显得很生硬，一看就知道是某种生搬硬套进来的东西。但一些没有开发过的地方却有着很自然的美感。另外，村庄一些地方有很多没有经过处理就随意丢弃的垃圾，以塑料制品、玻璃瓶居多。

2. 人居环境

村 2 组 20 多户村民的家一律是土木结构的房屋，很好地保持了原生态的风貌，有一两户的民居非常有特色。每家每户进门地方的景致都很有特点，有坡形的，有石砌的，这可以成为打造乡村家庭旅馆的基础。村民房间内部的装饰还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及改善。目前大

都处于一种很随意的状态，村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家的规划观念，需要培养村民的审美意识。

3. 资源管理

这里说的资源管理一般被称为垃圾分类。这是需要转变的第一个观念“所有的垃圾都是放错了地方或者用错了地方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完成娘娘寨的资源管理。

4. 实施目标

第一，在村庄看不到任何垃圾。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真正的世外桃源，要看不到垃圾。整个村庄要做到每一株小草都干净青翠。当你漫步在村庄的时候，享受到的是阳光、青草、银杏、小溪、茶场以及若隐若现的民居。

第二，村庄景区范围内尽量不放垃圾桶。每放置一个垃圾桶就制造了一个污染源。放的垃圾桶越多，污染就越多。所以，要直接从源头开始杜绝。配合相关措施，就不需要在景区放置很多垃圾桶，让这里成为不产生垃圾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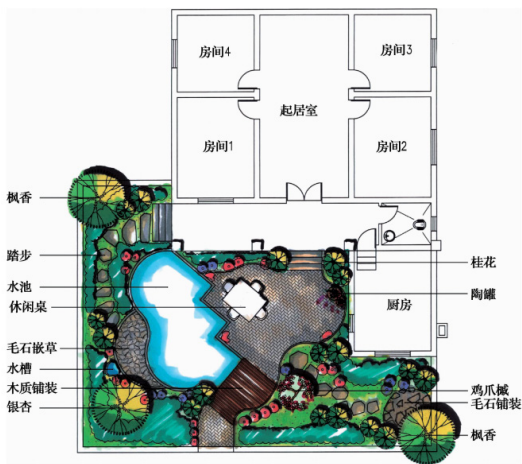
第三，杜绝一次性用品在景区的使用。杜绝一次性用品在村庄的使用，包括一次性的筷



子、杯子、餐具、拖鞋、盥洗用品等。作为旅游接待的农户更不能提供一次性的用品。

第四，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分类和以村庄资源分类中心相结合的体系。每家每户在后院自备资源分类桶，建议至少5种分类：塑料（含塑料瓶）、纸张、玻璃（含玻璃瓶）、纺织品、其他。具体分多少种，可以在与村民的培训讨论会上由村民自己决定。另外，这里没有列出厨房的湿垃圾，这些可以直接堆肥。目前，我们走访的村民家里大部分使用堆肥式厕所，也是一种环保又经济的厕所，而且没有太大的味道，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改造就可以进行旅游接待。

资源分类中心的建立以村庄的大小来衡量。另外，如果村子里可利用的建筑用地不允许的话可以不用建。以目前的实施方案看，因为



村庄的人口比较少，如果每家每户可以进行很好的资源管理，就没有必要建一个集中的分类中心。村里可以每周集中收集一次，集中处理。

第五，建立小型污水处理系统。每家每户在厨房、养猪、雨水、卫生间、堆肥等全程封闭式循环系统基础上，建一个小型的“孙式乡村水卫系统”——生活用水的处理池，以过滤净化的方式处理日常的生活用水，再进行排放。

第六，建设环境教育示范基地。要将娘娘寨打造成为一个环境教育示范基地，一个没有垃圾、净化眼球的地方。而做成的方式，是让人看不到任何水泥堆砌的成分，一切都融入文化，所能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中国千年文明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

（来源：农道联众）

用生态文明银行推动乡村振兴

——大南沟 2.0 版本

生态文明银行，是北京绿十字团队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乡村治理(自治)模式的一部分，通过村民自评、他评和村评等评议方式，最大程度地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并将村民日常的“嘉德善行”通过积分这种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使之能够量化和数字化，并成为党建引领下的家建和村建的依据。

模式。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成立后，我们协助村干部在村委会召开多次评议会，把山东单县张武楼生态资源银行评议会的 18 项积分项目缩减为 5 项：垃圾分类、美化庭院、志愿服务、孝老敬亲、禁烟禁赌，大大地提高了评议效率，缩短了评议时间，减少了村干部的工作量。



大南沟 2.0 版本

如果说单县张武楼生态资源银行属于 1.0 版的话，2019 年末，我们在河南省巩义市涉村镇大南沟村成立的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堪称 2.0 升级版。

生态文明银行是巩义积极探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一种创新



每天早上七点多，村里收运垃圾的车辆走家串户，喇叭响起来，家家户户早早把可沤肥的垃圾放到门口。村内还建起了“黑金工坊”，就是一座“变废为宝”的“堆肥站”，它是和生态文明银行一起为改善村庄居住环境，提高村民垃圾分类、废物利用的环保意识所提供的新路子。黑金工坊的建设秉承节俭实用的原则，



采用本地的建筑材料，并充分利用废旧砖和老物件。“黑金工坊，安全健康；垃圾分类，改良土壤”等内容写在墙上，充满了乡村建筑风格。

“黑金工坊”堆肥用的废物从哪来呢？就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来，比如厨余垃圾、庄稼废料等等，村里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回收。村民姜瑞典说：“每天早上大概七点多，就有人开着车来收我们分类好的垃圾，这能重新利用真是好。垃圾回收后，村里苍蝇都少了，环境也变好了。”这招“变废为宝”的办法，既能提高废弃物的再利用率，也能增强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大南沟村第一书记赵豪杰介绍，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的原则和方法，村里还给每户村民提供干垃圾桶和湿垃圾筒，以便进行分类。其中，湿垃圾筒就是用来收集可用于堆肥的厨余垃圾、庄稼废料等。大南沟村已引进项目发展原种农业种植，提高村民收入。从黑金工坊“变身”后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直接利用到农业种植上，也可以卖出去，增加村集体收入。

通过垃圾分类，村容村貌变了样，村里干净整洁了，也潜移默化地带动了村民们美化自家庭院的积极性，不少人家门前小院种上花草，构筑盆景……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志愿服务，同时，孝敬老人、戒烟控酒、禁赌禁毒也成为全村人的共同守则。

在大南沟进行的生态文明银行评议会，围绕五项内容依次展开，采用自己评、群众评、



干部（生态文明银行行长、包组村干部、组长）评相结合的方式，评议出各户的单项得分和总分。依据得分，现场评定出一二三等奖，并进行了积分兑换。整个活动阳光透明，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每一位村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通过生态文明银行评议会的开展，村民们参加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的劲头更大了，为乡村建设减少了几十万元的人力投入成本，内生动力被激活。北京绿十字为大南沟村捐赠价值3000元米面油用于启动评议积分兑换，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会秘书长翟云飞应邀出席生态文明银行奖券兑换仪式，并捐赠一批全降解垃圾袋，鼓励村民们在生态上下功夫，为保护美丽家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奖励项目与村民息息相关，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小事，但能把这些做好，就能让村里焕然一新。



“生态文明银行是乡村自治的一种有益尝试，是对国家推动的积分制的一种创新，起到了促进乡村建设的作用。我们把这一虚拟的银行做扎实，使之成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的抓手，服务于大南沟的全面综合发展。大南沟一天天的进步离不开各党群干部的积极参与，并自觉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垃圾分类的有关要求养成文明习惯，把环境打造得更加美丽。”北京绿十字主任孙晓阳表示。

自生态文明银行实施以来，大南沟村在弘扬生态文明、助力乡村振兴、加强乡风治理、促进乡村自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垃圾分类第一村”“乡贤治理第一村”……“通过这个虚拟的银行，大南沟的乡风文明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推动大南沟生态文明建设起到巨大作用。促进会计划将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黑金工坊等项目展开深度调研，将其打造成河南省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样板，将‘大南沟村模式’向全省推广。”翟云飞表示。

2020年12月2日，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检查组一行来到巩义市涉村镇大南沟村检查，我们向检查组一行介绍了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的运行情况。在大南沟村部生态文明银行办公室，检查组一行观看了生态文明银行的运行流程和评分标准，查看了生态文明银行台账和黑金工坊台账，当看到台账上面对“清洁家园、垃圾分类”给予的奖分最高时，检查组组长、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副司长给予了

河南机器人技能大赛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鸣锣开赛

12月10日，2020年河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器人赛项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齐聚一堂，角逐全省冠军。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比赛项目包括工业机器人应用、工业机器人编程、工业机器人维护等。参赛选手将展示其在机器人领域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卫华表示，学校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大赛，将其作为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希望参赛选手在比赛中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为河南省争光。

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的做法值得推广

12月10日，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检查组一行来到巩义市涉村镇大南沟村检查，我们向检查组一行介绍了大南沟生态文明银行的运行情况。在大南沟村部生态文明银行办公室，检查组一行观看了生态文明银行的运行流程和评分标准，查看了生态文明银行台账和黑金工坊台账，当看到台账上面对“清洁家园、垃圾分类”给予的奖分最高时，检查组组长、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副司长给予了

郑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11月20日，郑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小学生及其家长共同参与社区清洁、垃圾分类等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自觉参与环保，共同营造整洁、美丽的社区环境。

机器人系统安装与调试

12月10日，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机器人系统安装与调试比赛。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系统安装、参数设置和程序调试。比赛旨在考察选手对机器人系统的掌握程度和实际操作能力。

郑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11月20日，郑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小学生及其家长共同参与社区清洁、垃圾分类等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自觉参与环保，共同营造整洁、美丽的社区环境。

肯定的评价。用生态文明银行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有可复制性，值得推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民们重视生态文明银行，从一点一滴做起，在生态文明上下功夫；讲文明、讲道德，从自身做起，积极带动家人、朋友，共同投入到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共同努力，从生态银行开始，从当下做起，积极做表率、做榜样，让大南沟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中，走前头，出经验。

（来源：北京绿十字）

乡建资讯 » »

介绍关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热点和新闻，及时为乡建参与者或者想要了解乡建的个人、政府、其它单位等提供有效讯息。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董事会合影



孙麟理事长致辞

2022年1月15日，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在长沙熬吧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现场出席会议的有：理事长孙麟先生、理事彭慧女士、理事郭峰先生、理事印亚兰女士，农道基金会乡村振兴顾问钟正洪先生、唐宜荣先生、刘永学先生，荣誉理事叶强胜先生及候选荣誉理事吴道锋先生。因疫情原因无法到场的理事孙君先生、理事莫烦先生、荣誉理事张晓先生及荣誉理事廖星臣先生，监事胡家润先生及乡村振兴顾问孙策先生采用了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参与。由理事长孙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数超过理事会人员2/3，符合召开理事会规定。

1、理事长致辞

理事长孙麟先生对大家的积极参会表示感谢，介绍了理事会议程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汇报2021年工作；二是审议基金会相关制度及议案；三是讨论规划未来的工作计划，并安排2022年工作重点。

2、秘书长作2021年度工作汇报

秘书长印亚兰分别就运营、项目和研究三



秘书长印亚兰作2021年度工作汇报

部分进行农道基金会2021年工作报告。运营板块主要汇报了财务、行政综合、品牌传播及党建等工作；项目板块重点报告了围绕着“乡村相见小院”建设及运营等工作；理论中心报告了2021年推动出版乡村相见杂志及乡建理论图书等工作。

3、秘书处作2022年度工作计划及财务预算

秘书处薛晴初汇报了研究中心2022年工作计划，重点有四：一是进一步提升《乡村相见》杂志的专业性和时效性，全年计划出版四



秘书长印亚兰汇报 2022 年度预算

期正刊，两期特刊；二是建立研究中心信息资料库；三是规范基金会的图书编写、出版、发行流程；四是制定《乡村相见小院运行手册》1.0 版本。

秘书处吴青云汇报了项目中心 2022 年工作计划，重点是打造乡村相见小院的专业服务标准及流程，并累积启动 5 个乡村相见小院。2022 年会重点跟进南山村乡村相见小院及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两个示范点，梳理乡村相见小院服务全过程标准化内容。

秘书处王飞翔汇报了党支部及品牌传播中心 2022 年工作计划，将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完成基金会门户网站的改版升级，更好的宣传基金会品牌形象及扩大项目影响力。此外，将完成 6 次乡村相见主题沙龙，同时拟筹备推动许行乡村建设奖成立。

秘书长印亚兰汇报了农道基金会 2022 年度整体及各部门预算，提请理事会审议。

4、理事会审议通过计划、预算及制度

经理事会审议通过了 2022 年工作计划及预算；通过了《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工作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监事工作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接受捐赠管理办法》《湖南农道公益



理事表决现场

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会计电算化档案管理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合同及法律文件审查管理规定》《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公章及登记证书使用管理规定》《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暂行条例》《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薪酬管理制度》《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共 14 项制度。

5、审议通过基金会新增荣誉理事事项

为聚合乡村振兴力量，进一步推动基金会的乡村振兴工作，农道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新增吴道锋先生为荣誉理事的提案。（吴道锋：湖南省政府第八届省督学，湖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湖南省巾帼双创大赛优秀导师，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省残联培训组织优秀个人，湖南省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实施工作先进个人。在农民日报，农民科技培训，农业论坛等中央



理事长孙麟为荣誉理事吴道峰颁发聘书

媒体发表文章 40 余篇！)

6、审议预期基金会关联交易事项

基金会的关联交易，是指基金会和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根据要求，基金会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应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无关联关系理事出席的理事会中半数通过。

农道基金会理事会按要求合法合规的审议并表决了 2021 年产生的关联交易及 2022 年预期关联交易。无关联关系理事六人、表决理事五人，符合理事决议要求，到会无关联关系理事全体通过了《2022 年度预期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审议现场

7、监事发言

胡家润监事对理事会筹备期间细致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并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期望基金会可以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协助秘书处审查法律文书和相关合同；二是提醒秘书处在拟定年度预算时候，要考量相关费用符合慈善法的要求。

8、理事、顾问们发言

理事孙君老师，乡村振兴顾问孙策老师、钟正洪老师、刘永学老师及唐宜荣老师纷纷献策发言，对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及现有项目乡村相见小院、好支书沙龙及拟开展的许行乡村建设奖等项目给出了细致的建议及注意事项



监事胡家润先生线上发言



理事长孙麟总结发言

项，为基金会的稳序发展给与了专业化的建议。

9、理事长总结

孙麟理事长对今天参加会议积极献策的与会人员及秘书处的细致准备工作表达了感谢，并特别致谢孙君老师和孙晓阳老师的信任，表示对基金会的未来充满信心。

2022 年的中国乡村将更加美好！2022 年的乡村中国一定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更加夺目的光彩！

(来源：农道基金会)

乡村相见研讨会



乡村相见研讨会现场合影

2022年1月15日下午，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乡村相见研讨交流会在“熬吧”举行。研讨会围绕“乡村相见小院”项目及研究中心应如何发挥作用等两个主题进行。农道基金会理事长孙麟、理事彭慧、郭峰、印亚兰，农道基金会乡村振兴顾问钟正洪、唐宜荣，荣誉理事叶强胜、吴道锋，研究中心主任薛晴初及相关专家学者皮业林、闫效平、李立、袁树勋、卢新平、李焱林等近20人参加此次研讨交流会。

在关于“乡村相见小院”的定位问题上，与会人员提出，小院要发展为乡村治理的德治平台、居民之间的交流平台，各类资源的对接平台，公众力量的聚合平台，成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有效补充手段。

在关于“乡村相见小院”的服务主体问题上，与会人员提出，小院的服务对象应为乡村居民。要服务好居民，不能单靠基金会，要与政府部门、村支两委、各种社会力量保持好的良性互动。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启发农民的自主意识，让农村具有自我修复与自我发展的功能。

在关于“乡村相见小院”的服务方向问题上，与会人员提出，小院应把文化建设作为小院服务的核心内容，以文化建设来凝聚居民、影响居民、



研讨会现场部分嘉宾发言展示

提升居民，以文化保育来推动当地文化传承与发展，重铸乡魂。

在关于“乡村相见小院”的运营问题上，与会人员提出，小院应要在做好公益服务的同时，引入市场力量，围绕小院的目標及功能，对小院进行综合运营，实现公益与商业的有效融合，多途径、多渠道提升小院的造血能力，促进小院的可持续发展，让小院更具生命力。

围绕“乡村相见小院”这一讨论主题，与会人员还从小院的文化内涵、发展规划、建设标准、项目监督、合作伙伴、人才培育及合法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研究中心智库应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农道基金会《乡村相见》内刊主编闫效平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及生动的案例事实，从如何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建设好资料信息库、如何选题、如何选题、如何发挥出版效能、如何服务于小院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与会专家皮业林认为，研究中心要重点从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咨询服务与人才培养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其它与会人员也围绕此话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来源：农道基金会）

“社区微公益创投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专题研讨会举行



与会人员合影



点爱熊敏老师介绍小院前期运营情况

3月10日下午，“社区微公益创投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农道基金会举行。来自湖南唯实评估中心、湖南省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农道基金会的12位公益伙伴参加此次研讨会，并围绕“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湖南省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熊敏女士首先对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前期的运营状况做了整体介绍。从去年12月项目启动至今，村民对小院的认可度和村委对小院的满意度都有所提升。随着小院运营的不断深入，熊老师表示点爱将在团队能力建设，与包括村委和村民等在地伙伴及服务群体的沟通协作，以及进一步发现当地村庄能人和清晰村民需求等方面持续努力。

湖南省点爱社会服务中心社工、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首席运营官孙磊女士介绍了现阶段小院的重点工作，包括“与村民对接，了解小院周围的情况”和“小院的建设”两方面。目

前，金鼎山小院已完成一支活跃程度较高舞蹈队的组建，接下来，将重点在队伍核心骨干培养和组织化方面进行推动。孙磊女士希望在“要培育什么类型的组织”和“怎么聚集骨干”两方面能得到支持。

农道基金会项目总监吴青云先生对乡村相见小院的定位进行了回顾：一是打造乡村文化公益空间；二是聚合社会力量，做好外部项目的衔接落地；三是培育和赋能本地人才。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他认为首先是要了解居民的需求，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一定要与居民的需求相关，通过深度走访调研，融入居民生活，去挖掘居民的真实需求；二是找牵头人，发挥牵头人的作用，带动居民参与；三是明确意愿，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一定要得到村支两委的支持，才能壮大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四是推动社区微公益创投，制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步骤，选取乡村领袖等。最后，吴青云先生通过一个例子梳理介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流程。

湖南省唯实评估中心主任李焱林先生认



唯实中心李焱林老师给出建议

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乡村相见小院公益项目的核心。他也分享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的重点三步：一是居民基于兴趣而自发组织在一起。前期对社区进行走访调研，发掘居民需求，找到社区能人，并通过能人的号召力把有需求和有兴趣的居民聚集在一起，组成团队并制定公约；二是形成项目，把需求（兴趣）具体化，并完成项目计划书；三是项目评比。对于提交的项目通过海选和路演的形式进行评比，对优秀项目予以表彰。李主任还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评估”做了阐述。他认为，培育是对居民骨干进行培训，而陪伴是最好的赋能，评估要与陪伴赋能相结合。他认为评估有五个维度：自身的评估、专家评估、村干部评估、街道评估、同行评估。

农道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薛晴初女士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可以按照“故事—案例—课题—报告—理论”的逻辑来实行，要因地制宜地慢慢推进，不可过于求成。同时，要以党建为引领，并得到村支两委的支持。此外，她建议正确定位公益组织的角色与价值，平衡好居民和村委之间的关系。

农道基金会副秘书长丰伟先生发言时表示，一般而言，价值创造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样一个时间举行这次研讨会，对于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持续有效运营和价值



研讨会议现场

创造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此外，同时，他也认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和创造价值的真正动力来自于当地村民，基于当地人的真实需求和发展赋能当地人十分重要。

农道基金会秘书长印亚兰女士做了总结发言。她认为本次研讨会开得很及时和务实，也让我们更有期待和信心把接下来的相关工作做好。印亚兰女士代表农道基金会对点爱和唯实团队伙伴积极参与前期工作和本次研讨会表达了感谢。

（来源：农道基金会）

农道天下进行阜平县脱贫攻坚建设回顾

2022年2月4日，在举世瞩目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44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以纯净、空灵的天籁之音，用希腊语完美演绎了奥运会会歌《奥林匹克圣歌》。这些孩子全部来自太行山革命老区河北保定阜平县城南庄镇的五所乡村小学，是真正的“大山里的孩子”。2月20日，冬奥会闭幕式上44个来自阜平大山的孩子，返场重唱奥运会会歌。

合唱团中有来自农道天下团队参与规划设计的阜平县城南庄镇马兰村马兰小学的孩子，马兰花合唱团前身是组建于2006年的“马兰小乐队”。马兰村是《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驻地，2004年起，一位名叫邓小岚的北京退休老人把自己每年一半的时间放在了这里，为大山里孩子教授音乐课，坚持至今。她的父亲就是原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邓小岚在马兰村支教的故事，一直感动着我们。

阜平县城南庄镇域整体规划设计背景、契机：

阜平县，地处太行山北部东麓，一度被称作老区、山区、贫困区“三区合一”。城南庄镇区与北京市区的距离是300公里，是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所在地。

马兰村是晋察冀日报画报所在地，是人



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调研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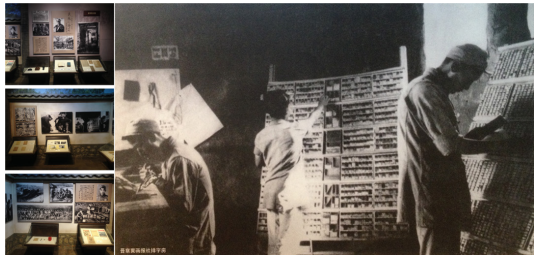
民日报的前身，有很多独特的红色资源。1948年春天，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由陕北转移至此，在城南庄生活、工作了46天。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农村地区考察，就来到阜平，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2020年2月29日，阜平县全县脱贫，这一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2015年3月份，阜平县委县政府与城乡统筹委确定“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合作共建工作，城乡统筹委作为社团组织代表，在脱贫攻坚任务中发挥专业职能，协助政府，共同遴选设计团队、集成技术、规范图件、把控风貌、施工对接等综合服务，在各个环节为政府做好咨询协调监管工作，发挥引领作用。

明确了“易地扶贫搬迁整合、美丽乡村建设搬迁整合及改造提升、棚户区改造”的建设模式。农道天下团队作为23支规划设计运营团队之一，进行河北阜平城南庄镇域整体规划设计工作。

城南庄镇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南部。



红色马兰

促进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专业委员会20



郑宇昌老师和统筹委领导在阜平现场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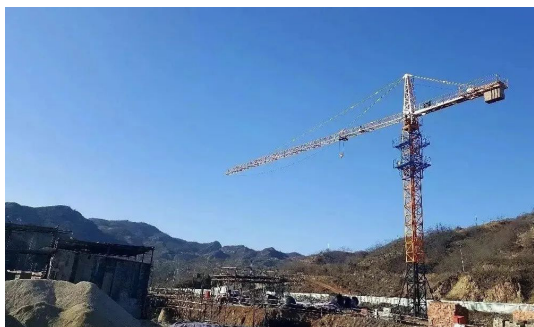


郑宇昌老师参加阜平交流会

辖 21 个行政村，镇政府驻城南庄村。农道天下团队完成六个自然村一个镇规划设计，包括城南庄镇区南台村、福子峪、麻棚村搬迁整合，向阳庄、马兰村、新房村提升改造，荣获了中国城乡统筹委授予的“2017 年度优秀乡建团队”等荣誉称号。

阜平乡建模式探讨

团队在前期调研中提炼出阜平美丽乡村建设特点，中国乡建尤其是阜平项目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而绝无统一的范本以供因循，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卷，这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探索，没有教科书，没有经验，一切



阜平建设实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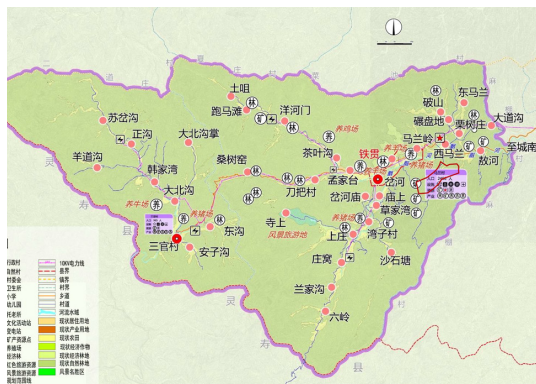
都要归零，让时间来验证。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阜平全县域全覆盖，规模大，参建单位众多，以精准扶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导并结合美丽乡村打造相关产业发展。其特点决定了阜平乡建模式的特点全域统筹协调，流程化标准化，每个环节都有其固有的流程。

搬迁整合：风貌比较单一，统规统建整体实施，大部分属于几种形式的相对复制（结合当地环境），具有模式化标准的特性。经过前期调研、民意调查、规划设计、户型配比以及整体布局的控制等前期工作。施工环境相对简单明了，使用具有大型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图进行施工。同时监理单位、项目管理单位等相关单位的介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提升改造：建筑风貌多样，每户宅院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在整体环境之中。在整体村庄规划的基础上对每户民居进行独立设计，结合每户不同需求（餐饮、住宿、自住等）以及已有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不同的设计方向，打造户与户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提升改造村大部分属于原房屋改造，使之具有更多不可预见因素。现实中标准化的门窗、施工工艺、施工要求等等使项目流程化标准化从而失去灵活性，一旦严格按照图纸施工（对于改造提升图纸无法完全表达，主要由驻场设计师根据现

场情况调整，增加房屋的生活化、艺术化），施工过程中将无法调整，导致施工队、设计团队在工作中束手束脚，很难形成理想的作品。**马兰村规划设计**



马兰村村域现状



规划总图



鸟瞰图

马兰村（原岔河村）位于城南庄镇西部深山区，距城南庄镇 20 公里，根据村庄优化布点搬迁方案，将马兰村（除西马兰村、三官村、

孟家台外）迁入马兰村集中安置。计划搬迁安置 892 户、共计 3117。村域现状主要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同时依托革命老区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村庄定位：农道天下团队结合马兰村资源、现状，将村庄定位“红色马兰”“生态马兰”“艺术马兰”，这与邓小岚女士在马兰村支教的故事互相呼应。成为马兰村长远发展的三张名片。

马兰村规划设计流程



团队前期工作开展



前期调研工作 郑宇昌老师在阜平现场

农道天下团队来到马兰村深入挖掘调研，收集资料数据。前期调研数据收集工作，为后面城南庄镇区规划设计工作展开打好基础。在



郑宇昌老师在马兰村做现场动员宣讲



马兰村改造提升签订四方确认、三方协议准备施工



项目方案分析讲解

同时建议乡镇组织去实地考察学习。通过宣讲动员有力的推动了后续规划设计工作。

方案分析讲解 / 汇报

签订协议 / 陪伴施工



方案优化汇报

马兰村前期调研中，团队成员通过当地村民的描述、实物的考证、现场的定位拍照等一点一点的记录并进行详尽的整理归类。

村民动员宣讲

团队采用动员宣讲方式，对城南庄镇的每个村都进行了两次以上的美丽乡村宣讲工作，第一次宣讲美丽乡村建设理念“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资源分类”“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让干部和村民对美丽乡村有了一个全面全新的认识，要建设好乡村先从打扫卫生做起，



从2016.7.15签协议，到2016.10.12号完成房屋浇筑，历时近三个月，农道天下团队驻场设计师与镇领导、施工队、住户不断进行沟通协调，保证施工进度，赢得户主及施工方的高度认可。



如今美丽阜平、美丽城南庄镇

马兰村民居改造

阜平县城南庄镇西马兰村提升改造第一户王勇章家。2016年7月15日签订开工协议，进行施工改造，第一户开工非常不易。

在阜平的乡村建设中，我们力求以新的视角和求知的精神，以传统村落机理为蓝本，以结合当代人对于乡村对于社会的理解，打造具有传统属性的现代乡土村落。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和乡村实际的实践模式。

农道天下团队在阜平城南庄镇区项目的乡村建设中，运用“七步走”的策略，遵循着孙君老师提出“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有力的推动了阜平城南庄项目前期调研工作和后续的规划设计工作。

七步走策略：第一步整体战略定位；第二步深入实地调研；第三步动员宣讲、发动群众；第四步头脑风暴方案设计；第五步方案多轮制作、修正、汇报；第六步方案讲解与百姓互动；第七步搬迁村完成技术图纸设计，提升村完成协议签订、陪伴施工。



郑宇昌老师和马兰小学孩子们一起唱歌

马兰小学小故事：

提起马兰村，便不得不说马兰小学，这所学校是邓小岚老师（红色新闻家邓拓之女）为村里的孩子们创办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爱”与“希望”的小学，更是故乡音乐的天堂。

对马兰村的设计中，邓小岚老师最为关切的莫过于马兰小学。在了解马兰小学的背景后，农道天下团队设计师将马兰小学定义为音乐主题，由于是供村里的孩子和将来外界前来参加马兰音乐节的孩子们使用的小学，在功能上进行了最大化利用。

在设计方案沟通过程中，邓小岚老师强调想让这所小学看起来更朴素、平和。不能太过童趣。为了达到邓老师说的简单朴素，农道天下设计师将一些“没必要的花哨”统统去掉，将整个方案做了一系列的减法。把马兰小学当做自己母校的情怀去融入，站在邓老师的角度去思考，融入孩子们的世界去寻找。

（来源：农道联众）



永泰举办第二期爱荆庄女性会客厅 传承良好家风

3月8日，妇女节，第二期爱荆庄女性会客厅在中国女绅文化孤本所在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获奖者——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洋尾村爱荆庄举行，宗旨是“活化庄寨，服务乡村振兴；古为今用，宣传女性文化。”会客厅由永泰县村保办、永泰县妇联、同安镇人民政府、同安书院主办，洋尾村村委会、爱荆庄女性博物馆承办，北京绿十字、“岚口·遇见台湾”民宿协办。

福建省优秀党员、洋尾村第一书记鲍道文主持会客厅，村支部书记鲍国清、村妇女主任张巧月和洋尾村数十位村民代表参加了活动。鲍道文结合爱荆庄鲍氏家训讲述了传承良好家风的重要意义，希望广大妇女能承担起责任，做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和爱荆庄乡村文明旅游使者。他说：“古人很重视家风的作用，培养子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更兼以悌、忠、信、礼、义、

廉、耻，让后人知进退，明荣辱，会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谋福。这也正是我们家庭建设和乡村建设所需要的。我们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把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是文明的延续。我们要重视家风，重振家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把爱荆庄的良好家风传承下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家庭建设中，我们女性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个家庭的家风。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开展得很成功，大家受到了良好家风的熏陶，未来我们要把爱荆庄女性会客厅办成一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校，一个传承良好家风的平台，让我们洋尾村的女性们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洋尾村妇女主任张巧月表示。

（来源：北京绿十字）

女摄影师为村民免费拍全家福 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爱的故事

“满哥，你这笑得不够，再来一张啰。”在众人的笑声中，“咔！”快门按下，村民龙军祥一家的身影定格在了李茵茵的镜头里。

这是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特别的一天。外地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开着车赶回来，老人们也全部穿上了过年的新衣——他们要留下一张代表团圆美满的全家福。

李茵茵是这次免费上门给村民拍摄全家福的摄影师，从2012年起，她就以公益摄影师的名义参与了很多公益活动。在湖南农道基金会和金鼎山社区社工室的邀请下，她欣然接下了这个为村民拍全家福的任务。

和一般的“写真摄影”不一样，拍摄全家福，更像是村民们的一次大聚会。在金鼎山乡村相见小院里，大家围在火炉旁边，聊聊家常，画面特别美好。有人一进门就围在摄影器材旁边，指挥熟悉的邻里乡亲们该怎么笑，怎么摆姿势。有人拿着多年前的老“全家福”对比新全家福，感叹时光的变化。一位老人的子女无法归来，她问李茵茵，能不能把孩子们P上去？

“全家福不仅仅是影像，更是家的象征，也是时代变迁、家庭生活的记录。”湖南农道基金会理事长孙麟说。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金鼎山社区村民的身上，或许也发生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身上。它代表了奋斗、和谐、温暖与爱。春节临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跟随李茵茵的脚步，采访记录下了全家福背后的故事。



它们或许平凡，但一定让你泪目……

敬老

送走公公那天，我把遗照捧在怀里带回家
口述：柳迎新

我从小一直住在组上，娘家也是本村的，现在大女儿读初三，小女儿上小学4年级。我和老公、小叔子都是初中同学。我和老公是前后桌，我上学的时候老欺负他。读初中的时候，村里人互相帮忙双抢，他们家几个人和村里人一起到我家里帮忙插秧。等到去他们家帮忙的时候，我家只有我哥哥去了。当时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去男同学家里帮忙不好，我妈妈就说那不行，别人到我们家来帮忙了，我们也要去别人家，互帮互助。那时候刚好下点毛毛雨，他们三个男孩子光着膀子在外面干活，我也在外面干活，他妈妈当时就说，你回来，不要搞了，等下淋雨了感冒，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家人不错。

到我20岁的时候，我的婶婶就给我俩做媒。我妈妈很赞成，我们也觉得合适，就在一起了。我公公不爱说话，但是对身边的人，对家里的人，很细心。村里随便一个人提起我公公都是一个“好”字。我婆婆36岁就得糖尿病，



左三为柳迎新，公公婆婆去世后，大家庭依然住在一起

我记得最深的是，每天起床，洗脸水热的，公公送到她手里，漱口水不管春夏秋冬，都是热的。其实我婆婆并不是生活不能自理，只是不能干重活。后来，婆婆在我嫁过来不久就走了。公公是2019年过世的，在湘雅医院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脑癌晚期，还扩散到了肺部。医生跟我们说，你们就回家算了，这种病就算住在医院也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如果你们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放在乡镇医院去疗养。我和老公商量，觉得公公养大两个儿子不容易，没享过一天的福，住院还是照顾得好一些。

后来，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公公就彻底回家住了。那段时间，老公对公公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很孝顺和有担当。公公想吃橘子，但是他不能吞咽，老公就把橘子捏出水，一点点喂我公公吃。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直接买一点橘子汁，老公说饮料太凉了，糖分太多了，怕吃了对老人不好。

公公还是走了。送殡的时候，本来说好是把遗像和骨灰放在一起的。但是临时放的时候，我突然舍不得，要拿回家。那天我穿一个长棉衣，我把拉链拉开，把遗像反过来，放在怀里，包在里面，我说老爸，我带你回家，我舍不得你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就跑回家了。

我和老公年轻的时候，两个人火气都大，

吵架的时候就是比谁的声音大，但我们有点好，就是不冷战，说出来就算了，所以人还是要多沟通，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年轻的时候，我总是骂他“五毒俱全”，爱玩，什么都喜欢玩。后来我公公走了，我老公就变了，什么事都做，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妥妥的。现在孩子也听话，我还可以帮忙做点村里的事情，我觉得日子很幸福。

奋斗

夫妻同心，再苦的日子也能甘来

口述：罗静

我是1997年从外面嫁过来的。那时候在外面学了电焊的技术，就找事做，找到了这里上班，然后认识了我老公。

女的学电焊不容易，十七八岁，眼睛刺痛，脸上刺得变黑，然后脱皮，然后又变黑，又脱皮。我老公那时候就总是守在我边上，讨死嫌（笑着说）。上下班也老是一路，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家里条件差些，就住在一个破瓦房里，什么都没有。我娘家条件还可以，他就咬紧牙关，要把家里搞好。

结婚前，我2000元一年的工资，我妈一分钱都没用，全部替我存起来了，结婚的时候就带了6000元过来，请水泥工建房子。结婚第二年，日子稍微好过一点，我老公就出了车祸，开车的那个老板也没钱，把车卖了，赔了我们几千块钱。但是我们四处住院求医花了18万元，到处欠了债。那时候村支书看到我们家的情况，还特意给了我们一个助贫的名额，给了我们100块钱。

那阵子，村里人都讲我们家估计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们两口子不服气，自己出去到处找业务。看到别人建房子，就去焊扶梯，别人装热水器，就去装铁水管。老公手受伤后不



左一为罗静，现在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过着勤劳而幸福的生活。

方便，重活都是我干。

那时到处找事做的日子，太苦了，苦得没法说。儿子出生没几个月，我们就出来做事，只能把他放到他姑姑那里带。后来儿子12岁的时候，我们夫妻把他接回来，他很不得见我们，又有点叛逆，我们也无奈，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到了寒暑假不上学的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都带着他。湘西、云南、贵州，他跟着我们在车上颠簸，也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2000年的时候，我们创立了门窗品牌“集盈堂”，那是我老公太爷爷的祖业老字号，现在在全国经销商也有500多家了。虽然家里条件好了，但是我老公人还是比较朴实，不像别的人赚了钱到处喝酒打牌玩，他就是每天做事。我儿子也蛮能吃苦的，每天清早就去拖材料。我觉得家里要条件好，就是要舍得做事，要吃得苦，不要讲排场，这样子日子才会过得好，好得长久。

辣利

农村妇女，可以干很多有意义的事

口述：杨国庆

我是1983年嫁过来的，娘家离这里不远，1984年生了第一个儿子，1987年生了第二个。



右一为杨国庆，她和儿媳妇都曾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出了名的能干

以前几十年，老公一直在外面跑货运，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我就在家里做点村上的事，又做生猪中介。夏天收猪的时候，凌晨2点就要出门，双抢的时候，那就更忙了，种谷子、打药，都是我自己。建房子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买材料、给工人搞饭吃，搭着做点事，建起了家里的第一套房子。

后来儿子大了，生活好起来。我媳妇也是个特别勤快的人，2016年，我生病割掉一个肾，她在医院里贴身陪护，比我自己女儿还管得多。反正我就是个道理，但凡儿子和媳妇闹矛盾，只骂儿子。

我觉得我们农村妇女，也可以干很多事，不要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打牌什么的。现在我就开了一个劳务公司，组织村里年纪比较大、有一点身体残疾、反应比较慢找不到事做的人，帮助他们在外面找点搞卫生的工作。说实话这个事不容易，我现在就是天天操心这个，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有意义。

育儿

教育独生女，他有一套

口述：龙军祥

我是本村人，家里是养猪的，现在屋里养



女儿在外工作也时常回家看看

着的十几头，都是我老婆管着的。我老婆很勤快，家里卫生，猪场的卫生都收拾得利利索索。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吵架，我老婆脾气好，什么都忍得了，我就一定要讲出来才行。现在年纪大了，吵架就少多了。

我们有一个独生女。因为是独生女，我怕她会变得自私，从小就教育她要多交朋友，学会奉献，也要学会独立。我记得她读幼儿园的时候，有几天下雨，我送她去幼儿园。后来天晴了，她也要送，我就说你如果不自己去就别去了，她自己在家里待了一天发现没意思，第二天好早就爬起来，跟住在楼下的同学一起去幼儿园了。

还有就是交朋友，我看现在好多小孩子抑郁什么的，都是没有倾吐的对象。我觉得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是一定要有朋友的。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就学会了奉献、合作，也学会了辨别社会的好与坏。我觉得这个教育还是很成功的，我女儿现在也有自己的圈子，虽然是独生女，一个人在外面做事，还是很独立，我也比较放心。

和谐

兄弟三代，从未吵过架

口述：龙立浩

我是1951年生的，今年71岁，我娘今年



右二为龙立浩，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母亲身体健康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

也89岁了。我娘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70多岁的时候，还下地干最重的活。有次半夜一点钟，我爹醒过来，看见床上没人了，到田里一看，她已经割了半亩田了。他们那时候累了就睡在田里，醒来就做事。到现在了，我娘不愿意住到城里，还是在家砍柴、捡稻谷。

我16岁的时候到四川凉山当雷达兵，每天都是到最高的山上去，海拔4000多米，氧气含量60%，写一封信给家里都要寄一个星期，一年就写那么几封信。在凉山待了17年，那时候真苦，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年轻时候吃的苦才是终身受益。

我弟弟比我小20岁，那时候他跑出租车，晚上跑长途我要给他帮忙。我们家里往上数三代，兄弟之间从来没有吵过架，也不像现在有的还要谈怎么分家产、怎么赡养父母，更别说了为了这个事情吵起来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的娘在家里只管收钱，只管享福就是。只有家里和谐，互帮互助，这个家才会兴旺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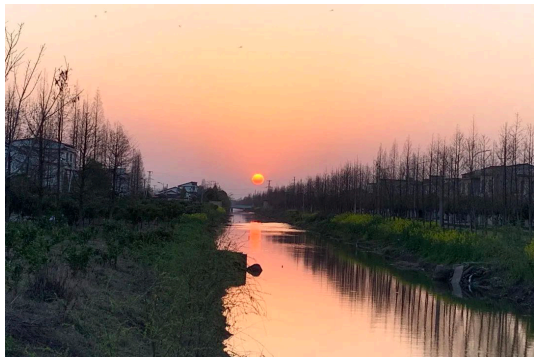
■ 湘妹子

乡村相见 遇见未来

初春的湖南，近日有了难得的好天气，晴空、蓝天和白云。

之前，多次听伙伴们提到南县南山村。而我入职农道基金会后的第一次出差也来到了这里。

傍晚时分，在南山村村口，下车便感受到空气的清新。向西延伸的河渠尽头是悬浮着的夕阳，它将河道水面也映得红通。河道两岸斜坡上显露着早春的新绿，还有黄色的油菜花。河道旁，矗立着一个直径约6米的水车，在微风中左右小幅摆动。向上仰望水车，目光顺着水车最高处偶遇天空中那一轮新月。



南山村夕阳景

我们来到村里的一个农家院，这是同事们来出差经常住的地方。不一会，老板回来了。热情和我们打招呼，说知道我们过来，他也还没吃饭，现在就开始准备晚饭。大约半小时，三道菜便完成了，很地道的农家味道。在腊味猪肉的火锅里，下的是刚从菜园里摘的青菜苔。对这里的人来说，因为离土地比较近，他们更能够把握食材，以及烹制方式的选择。我们称



南山村标牌

道老板做的鱼味道很好。老板说这里最好吃的鱼产自一个叫武圣宫的地方，因为几条河道的活水在这里交汇，河道很深。我们以茶代酒，感谢老板给我们烹制了地道美味的晚餐，还陪我们一起边吃边聊。

记得《悠然见南山一熬吧乡建十人谈》里提到，城里人需要乡村，来到乡村应该以串门的方式，在与本地乡村人的互动中，感受和体验乡村生活。这一晚，我们和老板的晚餐与交流，似乎有这个意思。

这个季节，乡村的夜晚算不上宁静——周边的稻田和河渠里传来声声不息的蛙声。这样的声音，意味着早春大自然的复苏，有些时候让人睡得更踏实。

第二天清晨，打开窗户，远处地平线上，太阳向上正爬出来。伴着第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村子这时候比夜晚更热闹了：青蛙、狗、鹅和各种小鸟，似乎在相互呼应，协奏着南山村清晨之声。



潮汐手工公益项目动员说明会

一只黑色的小狗摇头摆尾,热情地走过来。我拿着手机给它拍照,它显得依然开心自在。之后,它一路跟着我继续走了几十米。不一会,一只灰白色的小狗从不远处跑过来,陪我散步的小黑立马奔过去,它们开始欢乐地玩耍,扭打在一起。

上午,基金会同事吴青云与村委现场协调和准备当天“南山村潮汐手工计划公益项目”的动员说明会。下午三点,动员说明会正式开始了,村里的70多名妇女自愿报名前来参加。我们常说,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在回答为什么想着来参加这个活动时,一位村民妇女说: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就报名了。也想看看能

不能通过做这个事,给家里赚点钱呢。

前期,在引进潮汐手工计划的过程中,农道基金会与南山村村委和天津潮汐公益中心进行了多次深入探讨和交流。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来丰富村民妇女生活,增进连接互动和交流,也为村民增加一些收入。会上,赵书记对村民们说:这是一个好项目,但过程中肯定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退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支真正能持续参与的妇女队伍,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能够织出符合质量要求和用户需求的产品,从而慢慢影响和带动更多人的参与。

老百姓的实在,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品格。如何珍惜呢,或许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论从理念、价值、内容、形式和行为方式等都做到务实。最终,让老百姓能够有真实的参与、切实的体验和实际的收获。

乡村相见,遇见美好。

第一次的南山村之行,听到了许多美好的声音。之所以美好,或许是因为它们自然、真实和接地气。

(来源:农道基金会)

先行者，就是先干了再说

2月19日，有幸跟随农道基金会去益阳市张家塞乡合兴村考察学习。在谈到要不要农道来村里建“乡村相见小院”时，合兴村的刘主席毫不犹豫，“一定要干，村里还缺什么，那就补什么，一定要农道满意。现在不达标，一年半载内达到小院合作标准，也要干，还得干好。”

他明确表态时，甚至还不清楚“乡村相见小院”具体的功能和价值。老实说，我也不清楚“乡村相见小院”有什么魔力，甚至觉得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话说回来，作为农道公益志愿者，我认为农道基金会的成员们是富有热情和行动力的。我想，未必是农道的产品有多吸引人，而是认准了产品背后的这一群人。刘主席是“老江湖”了，一定深谙个中道理，正因为如此，他也才能邀请到了上海文博堂的文教授，让她千里迢迢，甘心从国际大都市来运营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乡村。

“乡村相见小院”准备谁来运营呢？这是农道基金会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文教授主动接过了任务，她说跟乡里签订了20年的运营合同，现在正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在干。她说：“就是死在这个地方，也一定要把这里运营成为‘有炊烟，有流水，有甜酒’的美好家园。”

太吓人了，什么时候乡村建设开始涌现了这么一批拼命的人呢？尤其刘主席的表态，对我这样一个胆小慎微的人来说，太值得去学习了。我常常是思来想去，不管想得多美好，大多还是因为某个细节没把握而最终干不成。他们这样，才是干事的方式：只要大方向对，具体的事先干了再说。

让我想起了最近在《逻辑思维》公众号看

到的一个有效行动者逻辑：“第一，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你在任何时候做理性判断的时候，信息都是不完善的。那第二呢，就是好事和坏事说不清楚，你在任何时点做利弊判断，看到的这个途径，很可能再往前行动一步，那就坏事变好事，所以在有效行动者的世界里，他永远相信两件事，第一先干了再说，因为只要干了，就会遇到更多的意外，就有机会把握时机，那第二呢，只要行动，就有机会洞察优势背后的代价，有机会把那些坏事变成好事。”

所谓的乡村建设先行者，那不就是在乡村建设中先干了再说吗？所有做公益的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吧，只要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先干着，不妨蹒跚地往前走，边走边调整。想法再精彩，那是想法的价值，真正的社会价值永远体现在行动之中。

放弃完美的想象，放弃反复权衡琢磨，直接诉诸于行动，不仅是做事的逻辑，还产生社会的意义。因为，对乡建者，对公益人来说，还有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有心人参与进来。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的一句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坚定的人能够改变世界。”公益者，先行者就是在坚定创造意义，人是“意义”的生物，行动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来源：农道基金会）

孙麟理事长考察长沙县金鼎山社区



4月14日，农道基金会发起人、理事长孙麟先生在秘书长印亚兰女士等陪同下，来到长沙县金鼎山社区考察。

金鼎山社区位于长沙县春华镇，距离长沙市区35公里，社区面积近13平方公里，下辖27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七千余人。

2022年1月，由农道基金会捐赠，联合金鼎山社区和湖南省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实施的乡村相见小院公益项目启动。项目致力于依托乡村相见小院，结合社区现状和需求，培育赋能当地社区社会组织，引进外部优秀公益项目和支持当地乡村建设骨干成长与实践，助力金鼎山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走进乡村相见小院，一面墙上展示着一幅一幅村民幸福的全家福，这是乡村相见小院落成后第一次公益活动“乐美全家福”的成果。

小院外面，孙麟先生饶有兴致地与社区书记、驻村书记、点爱社工和志愿者坐在一起交谈。从社区基本情况、产业、政策、人口、基础教育、养老，到乡村相见小院运营、公益活动开展、驻村社工生活和工作状态等，孙麟先生仔细询问和了解相关情况。

见到村里提前准备的水果，孙麟先生笑着说，招待外面来的人，如果用金鼎山本地土生

土长的东西，像酸辣椒、黄瓜，应该会更好呢。

之后，孙麟先生主动提出来要到村子里转一转，一行人来先后参观了稻香文化村落和春华镇万亩粮食基地等地。一路上，大家边走、边看、边交流。

听说金鼎山村有一个在校师生超千人的初中，孙麟先生很兴奋：这是金鼎山村最好的人气和希望。他希望基金会同事与村委、学校多思考和交流，如何让金鼎山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更好互动。

聊到村民文化生活时，孙麟先生与地方伙伴交流探讨，除了广场舞，是否能够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来组织开展相关乡村文化活动。大家谈到了太极，既有助身心，也不存在扰民的风险。

谈到乡村的产业引进与实施，孙麟先生认为人间幸福源自土地的滋养，真正可持续的价值和幸福，是基于对大自然、土地和背后规律的尊重。比如，农业始终生长于土地之上，背后自然需要把握“慢”与“快”的规律，在合理运营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的同时，农业还须与时间做朋友。

孙麟先生希望基金会秘书处保持同包括村支两委、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村社工等项目伙伴的积极有效联系与沟通，按既定项目规划和目标推进乡村相见小院公益项目有序实施，连接、激发和支持多方社会力量和个人有效合作和互动，将乡村相见小院打造成有内容、有内涵和创造价值的乡村文化公益空间。

（来源：农道基金会）